

# 近代中國的軍事身體建構，1895-1949\*

黃金麟\*\*

## 摘要

本文企圖以一個整體性和趨勢發展的視角，來分析軍事化身體在近代中國的建構過程，以及激發和形成這種身體的根本緣由。透過本文的討論，我們將看到 1928 年的軍訓教育方案，其實並不是特定歷史的起點，而是更為綿延的歷史潮流中的一個高點而已。它的發生雖然和國民黨在北伐成功後的統治處境有直接的脈動關聯，但也和起自清末的軍事改革，特別是新建陸軍與武備學堂的成立，以及強民論述和軍國民教育的鼓吹與實行，有著系譜上的傳承關係。另外，自一次大戰中出現的總體戰(total war)思維和總動員設計，乃至義務兵制的採行，也都加劇了這種身體建構在中國的實際發展。透過對新建陸軍的重新檢視和評價，以及對軍國民教育、童子軍教育、軍訓教育，和三民主義青年團的整體性考察，本文希望能對二十世紀初葉後的中國身體，特別是它受到來自國家的凝視和軍事訓練，有一個因果性的清晰解釋。與此同時，我也將證明這種國家對人民身體的壟斷，其實和普法戰爭後的民族國家競爭態勢，以及歐戰後的總體戰思維有著十分密切的關係。這種過往未有的國家體系和戰爭形式，是我們在考究軍事化身體在中國誕生時，不能忽略的現實。

關鍵詞：新軍、童子軍、軍訓、總體戰、義務兵制

\* 本文曾於 2002 年宣讀於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的演講會，與上海師範大學舉辦的「國家、地方、民眾的互動與社會變遷」國際研討會。作者感謝評論人沈松橋教授和兩會出席學者對本文的賜正與批評，同時感謝兩位匿名審查人對本文的建設性批評。文中論點如有誤謬，由作者個人負責。

投稿日期：2003 年 6 月 2 日，通過刊登日期：2003 年 10 月 2 日。

\*\* 東海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 從小站開始的歷史

以一個系譜學的角度來觀察，1928年由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所提出，並經大學院（今稱教育部）的教育會議所通過的「中等以上學校軍事教育方案」，其實只是近代中國身體軍事化發展的一個高峰而已。它不是前所未有的動作，也不是國民黨軍事官僚在完成北伐後的全新創舉。其發展和清末以來朝野人士試圖國家化和軍事化人民身體，以形成「國」與「民」的最終結合，有著一脈相承的關聯。這個爲了國族生存而進行的國民身體改造，雖然反映時代的需求和欲想，卻也讓中國的身體無法走出一條獨立於國族發展的路徑。這個限制和其所以如此展現的原因，在我們進行軍事化身體的系譜檢討時會有清楚的顯現。在本文的討論中，我將以一種趨勢發展的視角來分析這種身體的建構過程。我們將看到1928年的軍事教育方案和其所造成的軍訓教育普及化，其實只是更大規模歷史脈動中的一個峰頭而已。它不是特定歷史的起點，也不是中國特有的發明。它的發生雖然和國民黨的統治處境有直接的連動關係，但也和起自清末的軍事改革與軍國民教育有著系譜上的傳承關聯。另外，出現自一次大戰後的總體戰思維、國防經濟計算，和義務兵制的採行，也和這種軍訓身體的建構有緊密的脈絡關聯。這個整體性的觀察是瞭解這個身體建構的必要門徑，因爲它不但可以讓我們對軍訓的生成、必要性、作用和限制有一個清楚的認識，同時也能讓我們看到二十世紀初葉，中國身體是怎樣在朝野人士和國民黨的用心下，以及在新起的戰爭形式和兵役制度的牽引下，走上一條軍事化的發展路徑。<sup>1</sup>

要討論近代中國的身體軍事化發展，首先必須釐清的是，這個企圖大規模兵士化人民身體的活動，其實是十分晚近與急迫的動作。它的發生和十九世紀

---

<sup>1</sup> 本文係以建構論視角來討論身體的時代遭遇，這種考察可以讓我們對身體的社會生成，相對於其生物發展，有更多的警覺和觀看。這也是作者傾向以身體建構，或者說，軍事身體的建構爲概念，來描繪這些發展的原因。下文的討論中，我將以軍事化和武化兩個概念交替使用的方式來表述這個歷史發展。有關建構論的一般性討論，見 Chris Shilling, *The Body and Social Theory* (Newbury Park: Sage Publications, 1993), pp. 70-99.

中葉以後中國連番的軍事和政治挫敗，以及由此而產生的亡國威脅有著直接的關聯。它不是傳統武藝，或府兵與募兵等制度在近代的復興，更不是「文武合一」觀念在近代自然演繹的結果。這些制度或理念雖然早已存在於中國過去的歷史上，但並不是這個新起的規範性動作在制度上的源出者。這種危機時代所觸發的危機反應動作，已然清楚表現在歷史上，並成為後者的主要篇章。從 1885 年北洋武備學堂成立招生，到 1895 年袁世凱在天津小站按德國操典練兵開始，我們看到一個新的、按照西方軍事操典來進行的身體訓練，正隨著這種危機的加劇而出現在中國的地平線上。另外，從 1895 年開始，透過嚴復的〈原強〉一文所引發的「物競」、「天擇」思考，也讓人民的「血氣體力之強」成為眾所關注的焦點。而從此衍生的國民素質討論，也是我們在觀察武化身體的發展時，不能忽略的義理面向。因為這個「鼓民力」的訴求和隨後出現的「尙武」講究，實有著一脈相承的關聯。1902 年，由蔡鐸、蔣百里、和梁啟超等人領銜鼓吹的軍國民教育，就是試圖將人民身體軍國化與兵士化的動作，在學堂和學校中散佈。這個持續十餘年武化人民身體的動作，並沒有隨著 1919 年歐戰的告終，以及和平主義教育與公民教育的崛起而銷聲匿跡。蔣介石在黃埔的三年練兵(1924-1926)，和 1928 年國民政府決議中等以上學校全部實施軍訓教育，以及 1929 年後全國中小學實施童子軍教育，這些動作也顯示以現代的、西方的體制來造就全民皆兵的社會，依舊是這一時期歷史發展的基調。而 1942 年「國家總動員法」的頒佈，更是加深了這種身體發展在抗戰時期的合理基礎。這些陸續出現的動作正是我們在探討軍事化身體時必須關注的對象。

在思考這種身體發展時，我們不能將這種長期、特意的動作與民族國家的興起，以及民族國家試圖經營和壟斷人民的身體分開來看。因為上述的動作都和這種國家形式的出現，以及中國意圖成為其中的一員，有著因果性的關係。中國在甲午戰爭之後的連番政治改革，如變法的進行與新政的頒佈，其實就是在塑造一個新「國」。而國家主義思潮與社會達爾文主義在 1895 年後大行其道，也加劇了這種建國的合法性與必要性。這些以民族國家做為背景或題材的

論述，的確讓當時的中國知識論域充滿著「國家至上」的情懷。在《益世報》、《時務報》和《新民叢報》等的鼓吹下，包括德國政治學家伯倫知理(J. C. Bluntschli)等人的國家理論，迅速成為知識分子熱切討論和引用的政治理論。這種「國家至上」的氛圍甚至使得長期支配中國社會和身體的家族主義，處在岌岌可危的焦慮氣氛中。<sup>2</sup>而從嚴復的〈原強〉討論中所開發出來的「開民智、鼓民力、新民德」議論，也讓重塑國民身體的必要性獲得強力的道德支持。<sup>3</sup>這種同時並進的發展，和其中牽涉到的民強——國強邏輯，是造成後續中國身體所以走上軍事化發展的重要條件。

除此之外，在省視這種身體發展時，我們也必須對新軍（新建陸軍）的成立，以及它所開展出來的規訓身體方式給予特別的注意。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為新軍的訓練和它所涉及的知識與技藝，是中國過去未曾有過的。新軍的成立，等於是在中國打開一個凝視和模塑身體的「潘朵拉盒子」，使各種計算、控制和規訓身體的知識與技藝獲得展放的境地。雖然新軍的操演和它所講究的細緻身體訓練不是以全民做為對象，也沒有超出軍營的範圍，但它所塑造的紀律身體和戰鬥量能，以及從中顯示的身體可塑性，卻是後來各種軍事化身體措施一致想要達到的理想。當然在做這般聲稱時，我們必須將新軍的身體訓練與軍閥的割據中國、據地自雄分開來看。這裡我所要討論的不是北洋六鎮與軍閥的誕生關聯，也不是武力在民國的私化發展問題，而是新軍所體現出來的一種新的身體訓練方式，以及一種效率和紀律的身體如何在中國誕生的問題。這個

<sup>2</sup> 梁啟超對伯倫知理的討論是這個發展中最值得注意的部份。另外，張佛泉對梁啟超國家論的評論也是一篇值得閱讀的文章，見張佛泉，〈梁啟超國家觀念之形成〉，《政治學報》，期1(1971)，頁1-66。至於國家主義和家族主義的爭鋒相對發展，和兩者對近代中國身體的生成影響，見黃金麟，《歷史、身體、國家：近代中國的身體形成，1895-1937》（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1），第2、3章的分析。

<sup>3</sup> 有關嚴復對開民智、鼓民力，和新民德的討論，見1895年出版的〈原強〉一文，輯於王栻編，《嚴復集》（北京：中華書局，1986），冊1，頁13-15。這個論點後來為康有為和梁啟超等人所承接，成為清末改革運動的重要行動綱領。另外，嚴復在天津《直報》上所發表的系列論文，也對晚清「國民」觀念的產生和接續的論述有深遠的影響。有關這部份的詳細發展，見沈松僑，〈國權與民權：晚清的「國民」論述，1895-1911〉，《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73本第4分(2002)，頁685-733。

追本溯源的挖掘將可以讓我們看到一個新的軍事教養身體，是如何在中國開始的。

當然，在討論新軍的實際影響之前，我們必須知道，這並不是一個從地平線上突然崛起的練軍動作。因為在袁世凱接掌定武軍，改名為新建陸軍之前，以英、法和德國軍官做為教官的軍事操練，早就在左、李、曾等人的支持下，在 1862 年後零星出現在淮軍和湘軍的陣營中。這些以洋槍隊做為主體的西式訓練，構成了西方軍事操典在中國的初次實踐。然而，隨著淮軍在中法戰爭中的慘敗，以及刀矛訓練和作戰方式的無足憑恃，整飭軍紀、訓練將才，和學習戰陣攻守等知識，就成為 1885 年後中國在武備上的重點工作。<sup>4</sup>也是在這種背景下，第一所的陸軍軍官學校——北洋武備學堂應運在中國誕生。這個影響後來新建陸軍甚深的人才培養單位，它的訓練不但直取德國的訓練方式，同時也讓這種訓練方式透過學員的學習和親身傳授，傳散到新軍和其他的軍事學堂中。<sup>5</sup>當然，德國之所以取代英、法，成為中國訓練軍隊的唯一選擇，和 1870 年普法戰爭中德國陸軍戰勝法國，以及由此而成為世界陸軍的首強形勢有著直接的關聯。自此之後，我們看到包括北洋武備學堂和其他的新建陸軍學堂，都是以德國陸軍操典做為教育學生的範本，甚至直接聘請德國軍官來華教授列隊、射擊、炮陣、作戰和指揮技能等課程。<sup>6</sup>而學生入學後，必須先經過一個

<sup>4</sup> 淮軍雖然在 1862 年後開始採用西洋兵器與西式操練，但這些負責訓練淮軍的西洋教習並不能調度和指揮淮軍的作戰。這種練兵不練將，甚至以全然不懂西法的統領營哨官來帶兵作戰的情況，是淮軍在中法和甲午戰爭中相繼失敗的重要原因。武備學堂的崛起，就是為了彌補這種嚴重的缺憾。有關淮軍在訓練制度上的缺失檢討，見羅爾綱，《淮軍志》（香港：香港書店，1973），頁 117-143。

<sup>5</sup> 按史全生等人的統計，從 1896 到 1904 年中，中國各省總共開辦了 22 所陸軍學堂，其中許多教習皆為北洋武備學堂的畢業生。在袁世凱所控制的十餘所武備學堂中，更是約有 90% 的校長、監督、總教習和教官來自這所學堂。新軍的組成，包括袁世凱的新建陸軍和張之洞在同年於南京組訓的自強軍，都有大量的北洋畢業生在其中。以新建陸軍為例，軍官就有高達 79% 的成員來自這個學堂。這些例證說明，北洋武備學堂的訓練對於後來中國建軍實在具有開山闢地的影響。見史全生編，《中國近代軍事教育史》（南京：東南大學出版社，1996），頁 61-74。另外，王家儉，〈北洋武備學堂的創設及其影響〉，《師大歷史學報》，期 4(1976)，頁 317-344，也對此影響多有說明。

<sup>6</sup> 除了德國教習之外，日本教習也是當時的重要師資來源，但在教授的內容上則仍是以德國操典做為範本。見郭鳳明，《清末民初陸軍學校教育》（臺北：嘉新水泥文化基金會，1978）一書

月的「站、轉、走」等基本動作的訓練，然後才開始學習槍法、打靶，和炮隊、步隊、工隊及其他分合陣法。<sup>7</sup>這種從身體動作開始的訓練，也成為往後所有軍校和部隊訓練的基本步驟。

這種因應新式武器與作戰方式的改變而產生的身體訓練，等於宣告舊有的湘、淮軍訓練將不再成為軍隊訓練的正統。而過往行之千年的，以戈、矛、弓、刀、矢、石做為考試項目的武舉制度，也將面臨被裁廢的命運。<sup>8</sup>這種近乎一場軍事訓練革命的發展，它的出現和造成的影響是不應該被低估和忽略的。因為和 1853 年曾國藩手定的湘軍訓練手法相比時，我們不得不驚訝於其中經歷的巨大變動。按曾國藩的要求，湘軍的訓練內容主要有跳躍、投擲、行軍、射擊，和熟練戚繼光的鴛鴦陣與三才陣。為達此目的，他要求所有成員必須能縱步上一丈高之屋，跳躍一丈寬之溝，拋火球達 20 丈開外，以及腳繫沙袋日行百里。<sup>9</sup>這種講究個人武功的操練方式，自然和講求動作齊一、肌肉搭配勻稱，和姿勢標準的現代兵器身體訓練，有天壤之別。在這種差異中，我們看到一個新的軍事化身體訓練正在中國出現。不過在 1895 年之前，這種發展形勢尚處在初生階段，而且泰半集中在為數不超過五所的武備學堂中。這種侷限的發展，直到新建陸軍和自強軍的成立後，才有實質的改變。因為從此開始，新式的身體訓練就成為幾十萬中國軍隊的制式訓練範本，而隨著時間的拉長，其影響層面和對象也漸次擴大。這是我們在接下來的討論中會看到的面貌。

從以上的討論中我們看到，新軍的建立等於是將這個源自德國的身體訓練方式，實際地施轉於眾多的兵員身上，使它從一種理論變成一種可見的真實。這個由袁世凱在天津小站開始的工作，不但使德國操典成為中國軍隊操練步

---

中對 1895 到 1916 年陸軍學校教育的分析與記載。

<sup>7</sup> 見 1886 年《北洋武備學堂學規》，第 10 條、第 17 條。

<sup>8</sup> 從 1898 年開始，清廷內部就曾針對武舉的存廢進行過冗長的辯論，但隨著戊戌變法的失敗，這個爭議也隨之中斷。武舉的真正廢除是在 1901 年，也就是八國聯軍攻佔北京後一年，這個「事實勝於雄辯」的戰敗結果，終於讓這個起自唐代的武科選才制度，在光緒宣佈永遠停止下正式走入歷史。有關期間經歷的爭議和結果，見史全生編，《中國近代軍事教育史》，頁 75-80。

<sup>9</sup> 見王爾敏，《淮軍志》（臺北：中國學術著作獎助委員會，1967），頁 191-192，對淮軍訓練的記載。

法、手法、陣法、口令和戰技的正式操本，同時也使得按表操課的訓練方式成爲標準的作業流程。在新軍身上，我們看到從單兵的站、轉、走，到班、排、連的隊列訓練，包括列隊、散開和隊形變換等技藝，被引進中國的軍隊中，成爲組織和擺置身體的標準格式。而包括武器的使用和保管訓練，以及各種攻擊和禦敵陣式的講解與實習，也成爲重要的教練內容。爲了使這些知識和技能獲得普遍一致的推行，袁世凱還特別將新軍的各種操練繪製成圖，刊刻成《訓練操法詳晰圖說》，以爲北洋各鎮做爲訓練的參照。<sup>10</sup>除了進行基本動作、隊形、戰技和戰術的教導外，新軍的訓練也十分講究「經史大義」的灌輸，以使忠君和節義精神成爲軍隊行動的意識骨幹。爲此，他們還特別將忠義的要旨編輯成歌訣，以利兵丁記憶和執行。當然，若和稍後出現的黃埔練兵相比，這一時期的軍事養成主要還是以軍事動作和戰技訓練爲主，基本上革命意識形態的培養還沒有出現。

新軍的練就，除了牽涉到知識、技能和各種裝備與設施的建置外，這個不同於鄉勇與團練，也不同於八旗與綠營的軍事組織，對時間和空間的敏感應用也達到一個前所未有的境界。這種企圖透過嚴格的時間和空間控制來進行模塑身體的工作，在新軍的訓練中幾乎到處可見。例如，從「冬春兩季日課」和「夏秋兩季日課」的事先制定，到「兵丁日行規條」的提出，規定兵丁每日必須以十分鐘、二十分鐘、三十分鐘或一小時等做爲單位，以進行飲食、盥洗、跑步和軍事訓練等，就清楚顯示曆法和鐘點時間的應用，對於身體的座落和表現的關鍵作用。<sup>11</sup>而步法的訓練更顯現了時間在身體的規訓上具有無形穿透的影響。以新軍操典中所規定的便步、慢步、正步和跑步爲例，它不但規定每步應行的距離，同時每分鐘應行多少步，也有明確的規定。<sup>12</sup>它的精密程度，甚至

<sup>10</sup> 見段祺瑞等纂校，《訓練操法詳晰圖說》（臺北：文海出版社，1966）。

<sup>11</sup> 有關「冬春兩季日課」、「夏秋兩季日課」和「兵丁日行規條」等條文的表述，見段祺瑞等纂校，《訓練操法詳晰圖說》第二冊的記載。有關陽曆和鐘點時間在中國的引進使用，以及對身體所造成的諸般影響，見黃金麟，《歷史、身體、國家：近代中國的身體形成，1895-1937》，頁 175-229。

<sup>12</sup> 這些步法中，便步每步必須達六十生特密達（公分），合工部尺二尺二寸，一分鐘應行一百二

連治軍謹嚴的湘軍都無法匹敵。這個在〈新建陸軍兵略錄存〉中留下來的記載，讓我們清楚看到新軍是如何透過時間的掌控和德國操典的運用，練就一個深富秩序、紀律和效率的戰鬥身體。而它所達到的紀律和訓練效果，也是過去未曾有過的。沈從文的經歷和他對這個訓練的描寫，清楚表明這種訓練與舊有訓練的不同：

新式教練看來雖十分合用，鋼鐵的紀律把每個人皆造就得自重強毅，但實在說來真無趣味……一下操場總是兩點鐘，一個跑步總是三十分鐘，姿勢稍有不合就是當胸一拳，服裝稍有疏忽就是一巴掌。盤槓桿，從平台上拿頂，向木馬上撲過，一下子慣到地上時，哼也不許哼一聲。過天橋時還得雙眼向前平視，來回作正步通過。野外演習時，不管是水是泥，喊臥下就得臥下……可是舊式的那一組，他們卻太瀟灑了。他們學的是翻筋斗、打藤牌、舞長槳、耍齊眉棍。我們穿一色到底的灰布，他們卻穿各色各樣花衣……他們或單獨學習，或成對廝殺，各人可各照自己意見去選擇。他們常常是一人手持盾牌軍刀，一人使關刀或戈矛，照規矩練「大刀取耳」、「單戈破牌」，或其他有趣廝殺題目。兩人一面廝打，一面大聲喊「砍」、「殺」、「摔」、「坐」，應該歸誰翻一個筋斗時，另一個就用敏捷的姿勢退後一步，讓出個小小地位。應該歸誰敗下來時，戰敗的跌倒時也有一定的章法，做得又自然、又活潑。<sup>13</sup>

這個鮮明的差別和對比，清楚顯示新軍在放棄以拳、棒、刀、矛等做為學習對象後，所經歷的訓練變化。而就歷史的發展而言，我們清楚看到，這個新起的軍事訓練正取代傳統的武藝訓練，成為一個正統的訓練方法。此一發展也成為往後軍國民教育和軍訓教育的主要採行路徑。雖然沒有讓傳統武術就此從

---

十步；慢步每步大約八十生特密達，一分鐘應行六十步；正步每步大概與慢步同，一分鐘應行一百一十四步；跑步每步則為一密達（公尺），一分鐘應行一百六十五步。見〈新建陸軍兵略錄存〉，來新夏編，《北洋軍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頁196。

<sup>13</sup> 沈從文，《沈從文自傳》（江蘇：江蘇文藝出版社，1995），頁46-47。



訓練和健身的場域中消失（詳見下文），不過也因為有這個事實，我們必須對新軍在中國的出現進行重新評估。過去將新軍的成立從獨立、純軍事角度觀看，甚至把它和民國的軍閥亂政關聯在一起，認為是武人干政所以產生的基本原因，這些評判容或各有見地，但它們顯然沒有將新軍所開展的身體訓練，以及它所造成的紀律風氣列入討論的範圍。<sup>14</sup>這無疑是對新軍歷史的低估。這種單從軍事和政治後果來進行評量的做法，將使我們無法看到新軍所建立、引介的知識和訓練，對中國身體所造成的深遠影響。

宣稱新軍的出現代表一個新紀律身體的誕生，這個命題必須和新軍的後來政治表現加以區隔，因為民初武力私化的發展和它所引發的鄙夷軍人效應，的確讓新軍的存在蒙上一層陰影。在這裡我們必須謹慎區別，以軍人做為擬仿對象的身體發展，其實並不等於以新軍做為學習對象的發展，這兩者在民初是有實際區別的。之所以產生如此奇異的現象，主要是因為民國以後各地軍閥爭相徵兵、拉夫和練兵，形成兵為將有的實力統治局面，的確讓「兵」的社會形象在軍閥據地自雄與民無寧日的狀態中，墜入谷底。陳獨秀將「軍人」列為中國的三害之一，說明權閥擁兵自重已經對新軍塑造出來的現代感與紀律性，造成否定性的傷害：

世界上的軍人都不是好東西，我們中國的軍人算是更壞。威嚇長官，欺壓平民，包販煙土，包販私鹽，只要洋鎗在手，便要殺人放火，打家劫舍，無惡不作。那為首的好漢，還要藉著這班「官土匪」的勢力，來逼迫總統，解散國會，搶奪軍械，把持政權，破壞法律，直弄得全國人民除軍人外都沒有飯吃，這不是中國的大害嗎？<sup>15</sup>

這個「官土匪」的稱呼，其實並不是陳獨秀的專用語，它是當時一般人民與知識分子對於軍人的共同認知用語。而「穿著制服的土匪」描述，顯然和 1895

<sup>14</sup> 見劉鳳翰，《新建陸軍》（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67）；赫治清主編，《中國軍事制度史：軍事教育訓練制度卷》（鄭州：大象出版社，1997）；來新夏編，《北洋軍閥》等論著的討論。

<sup>15</sup> 見陳獨秀，〈除三害〉，《獨秀文存》（上海：亞東圖書館，1922），卷1，頁589。原文發表於1919年1月。除了軍人外，另外兩害為官僚害與政客害。

年後新軍想要銳意經營的規矩與自重強毅精神，有天壤之別。這種紀律與形象上的「墮落」，自然很難讓新軍成爲後起軍事化身體建構的學習對象。

但是這種鄙夷和批評並沒有遏止軍事化身體在民初的廣泛建構。就在中國智識界一片譴責「官土匪」禍害國家與社會的同時，也正是軍國民教育在中國達到巔峰發展的時期。這個一面強調「軍人不是好東西」，一面企圖將全民塑造成爲軍人的矛盾發展，證明新軍的「墮落」其實並沒有造成軍事化身體在中國的停滯。相反的，它讓許多知識分子因此認清，中國的前途不能置放在少數握有武力的軍閥手上，而必須以全民的武化來達到救國與衛國的目的，以實現中國的獨立與自主。此一認識和實踐，在 1919 年學生抗議北洋政府媚外賣國，要求學校加強實施軍事教育時，已經清楚顯現出來。當然，這個矛盾的發展也讓我們意識到，軍國民教育和新軍之間並不具直接的關聯，但也不是全面的對立。我之所以這麼說，主要是因爲 1902 年軍國民教育開始提倡時，甚至在它最巔峰時，都沒有以新軍做爲學習的範型，但不能否認的是，從軍國民教育自日本引進開始，新軍所欲造就和實現的身體，就一直是軍國民教育想要完成的理想。這個深層的相似和義理上的呼應，是我們在觀視兩者的發展時必須特別留意的地方。除此之外，起自德國的軍事訓練方式，也可以在軍國民教育和新軍的訓練中輕易發現，這個共同的「血統」讓我們不能簡單地將兩者對立起來看待。

如果說新軍所開始的是一個現代，但卻限於軍事營地的身體發展，那麼 1902 年開始的軍國民教育則是試圖將這種軍事身體變成一般性的身體生成條件。之所以會產生這種廣泛的軍事身體要求，和甲午戰爭的失敗與庚子事變的爆發有莫大的關係。中國敗於日本與八國聯軍攻佔北京，都讓中國的知識界不得不正視民愚兵弱可能帶來的滅國滅種危機。這個直逼而來的壓力，除了造成戊戌變法與新政措施外，也讓物競天擇的觀念和「鼓民力」的要求獲得絕對的正當性。這也是軍國民教育和新民論述能以風行草偃的姿態出現在中國，並獲得各自所需要的權威的原因。這個變化說明，軍國民教育會成爲朝野共同支持

的運動，以及「尚武」會成爲一個時代的表徵，和時局的演變確實有著因果性的關聯。它不是新軍發展到某個階段後自然衍生出來的東西，而是客觀環境和主觀欲想共同形塑出來的結果。這種爲了國存而產生的特定身體訴求，其特質清楚表現在軍國民教育的一般聲稱上。我們也看到，此後的系列軍事身體建構工作，其實都和軍國民教育的發展有綿密的對話和衍生關聯。

就軍國民教育的目的來說，它最主要的工作就是要實現「軍民一體」，使國家能透過軍國民的生產完成特定的時代使命。這種人民是工具，國家是目的的發展態勢，是軍國民教育的重要特質，也是它於 1902 年隨同國家主義興起而大肆風行的原因。蔣百里的聲稱和詮釋，清楚顯現軍國民教育在此一階段所欲完成的理想，以及達到「軍民一體」應該要進行的工作內涵：

凡社會上一切之組織，皆當以軍事的法律布置之；凡國防上一切之機關，皆當以軍事的眼光建設之；社會之精神、之風俗、之習慣，皆當以軍人之精神貫注之。軍人形質之在於外者，國家賴之以安寧，軍人精神之在於內者，則國之所由立也，民之所由生也……軍人耶，國民耶，則一而已矣，則一而已矣。<sup>16</sup>

這個理想的訴求和它所欲形成的一種斯巴達精神在中國的再現，是體操、兵操、拳法、刀法、鎗法、游泳和競漕等遊戲，以及行軍、射擊、演習和遠足等，在清末民初的學校盛行的主要原因。除了這些尚武動作的積極講究與操練外，軍國民教育的推動還直接促使軍事知識在學校普及傳播。在這種趨勢下，重要的軍事智識，如兵役爲國民之義務、海陸防要務、軍事戰史和名將勇士的傳記等，都成爲學生學習的知識對象。這種從身體動作、體能，到認識能力的培養，是學校軍國民教育的重要特色。而它所欲完成的，毋寧就是蔣百里口中所說的「則一而已矣」的理想。與此同時，軍國民教育也強調社會教育的重要，這部份則透過在公眾場域建立勇士銅像，雕刻激戰場面，獎勵擊劍和柔術等活動，以及利用新聞、演劇、文學、美術和歌藝等方式，來提升人民的愛國意識

<sup>16</sup> 蔣百里，〈軍國民之教育〉，《新民叢報》，號 22(1902)，頁 34-35。

與身體能力。至於在家庭方面，則應實行當年斯巴達的經世策略，以優生學的政策讓國民獲得一個健全的體格與良好的心智。如此以學校做為出發場域，以人民身體做為改造對象的努力，是軍國民教育在 1902 年後帶給中國的重要影響。而它最後所要完成的，就是透過教育的手段讓愛國意識與肉體表現結合在一起，使個體的身體成為國家利益與意志的載體。吳宓幼年經常以學校所學習的體育和軍操做為玩耍方式，要所有玩伴排隊練習兵操，同時在廳堂中堆起桌椅几凳，當做城廓山嶺，進行行軍和作戰的演練，這種內化作為正是軍國民教育試圖在學生身上留下的印記。<sup>17</sup>吳宓的例子讓我們看到它在個體身上的成效。

雖然軍國民教育所鼓吹與嚮往的是一種古斯巴達的「剽悍勇俠之風」，以及這種風氣在德國與俄國表現出來的傲人氣勢，但真正讓中國知識分子震撼於心，並勇於放棄積習，努力擷取軍國民路線的卻是鄰近的日本。日本在明治時期的戮力維新，改革體制與武備，所形成的好武精神與威霸氣勢，讓甲午戰後的中國知識分子不得不捫心自省，承認「尚武」對於一個國家屹立於世的重要。就在這種體認下，包括蔡鍔、蔣百里、梁啟超、賈豐臻、楊度、張謇和蔡元培等重要知識分子，相繼投入軍國民教育的倡導。重要的期刊如《新民叢報》、《游學譯編》、《湖北學生界》、《浙江潮》，和國內的報紙如《時報》、《大公報》和《順天時報》等也陸續以軍國民教育為題，大幅討論其對中國的必要性。這個特定而且深富時代性格與意義的教育形式，就在這些知識分子與報刊的引介下，成為中國教育的主流。直到 1919 年戰後和平思潮崛起前，它都是中國教育場域中的主導思維。

以軍國民教育的制度化發展來說，1906 年是一個關鍵的轉折。因為這一年清廷不但頒佈中國有史以來的第一個國家教育宗旨，同時還把尚武、忠君、尊孔、尚公和尚實並列為國家教育的目標，這在學部當年的上奏中有清楚的表

<sup>17</sup> 吳宓，《吳宓自編年譜》（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5），頁 65、83。吳宓當時唸的學堂是陝西宏道高等學堂，時間為 1906 年。

示。當然，其中所表現的論述重疊性，也清楚證示起自蔡、蔣一輩的倡議已經成爲朝野的共同意識：

惟中國當列強雄視之時，必造就何等之國民，方足為圖存之具，此不可不審者也……今朝廷銳意武備，以練兵為第一要務。然欲薄海之民，咸知捐一生以赴萬死，則猶恐有不能深恃者，何也？餉糈之心厚而忠義之氣薄，性命之慮重而國家之念輕也。欲救其弊，必以教育為挽回風氣之具。凡中小學堂各種教科書，必寓軍國主義，俾兒童熟見而習聞之。國文、歷史、地理等科，宜詳述海陸戰爭之事蹟，繪畫砲臺、兵艦、旗幟之圖形，敘列戍窮邊使絕域之勳業。於音樂一科，則恭輯國家之武功戰事，演為詩歌，其後先死綏諸臣，尤宜鼓吹蓋揚，以勵其百折不回視死如歸之志。體操一科，幼稚者以遊戲體操發育其身體，稍長者以兵式體操嚴整其紀律，而尤時時勗以守秩序，養威重，以造成完全之人格……中國如採取此義，極力仿行，日月漸染，習與性成，我三代以前人盡知兵之義，庶幾可復乎。<sup>18</sup>

這個「人盡知兵」的要求並沒有隨著清廷的傾覆而終止。1911年後，蔡元培（時任教育部長）對於民國教育所提出的意見書，就開宗明義地指出「軍國民教育者，誠今日所不能不採者也」。<sup>19</sup>這種體認也是當時各省教育會的共同立場。這個一致的立論和努力，讓學校成爲規訓和標準化國民身體發展最重要的畛域。民初對於學校衛生學的看重，要求各級學校必須在建築形式、整齊清潔、急救治療，和傳染病的預防上有所作為的規定，以及主張學童必須進行系列體能活動，以達到鍛鍊身體和養成健康身體的目的，其實都和這種思潮的發展與達爾文天擇思想的普及有著密切的關聯。1915年，全國教育會聯合會通過關於軍國民教育的實施方法，更是具體顯露這種教育方式在當時所受到的重視，以及對後續身體教育的關鍵影響。由於這份文件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sup>18</sup> 榮慶等，〈奏請宣示教育宗旨摺〉，《光緒朝東華錄》（臺北：中華書局，1958），頁5494-5495。

<sup>19</sup> 蔡元培，〈新教育意見〉，《民國經世文編（教育）》（臺北：文海出版社，1970），頁4083。

我將它摘要如下：首先，這個決議規定，「小學校學生宜注重作戰之遊戲」，各學校應添授中國舊有武技，而各學校教科書也應揭舉古今尚武的人物與關於國恥的事項，學校教授的樂歌也應選擇雄武的詞曲，以激勵學生的志氣。師範和中等以上學校的體操學科，應採嚴格鍛鍊主義，並在最後學年加授軍事學大要；兵式槍操在最後學年也要實行射擊。除此之外，它也規定，「小學校學生宜養成軍國民之性質，及軍人之志趣」；中等以上學校學生應具有服兵役的能力，學校應進行學生的體格檢查。與此同時，它更提出高等小學以上學生應一律穿制服；中等以上各學校應參用軍校規則來進行管理。<sup>20</sup>這個著重武化和身體紀律管理的規則，清楚說明軍事化的操練和管理在 1910 年代的中國所具有的無上威力。不過在強調時，我們也不能忘記，因為城鄉的差距、教育經費的有無，和政府行政能力等的限制，在中國並沒有形成一致性的結果。制度與現實的落差，是我們在檢視這場運動時不能忽略的問題。

與軍國民教育聯繫在一起，並且也需要稍加說明的是傳統武術和武術會在身體訓練上的問題。在軍國民的教育中，我們確實看到武術的成份存在，而 1915 年所召開的全國教育會聯合會，也同意將武術、體操和兵士體操並列為學校體操的主要內容。不過被列入正式課程的武技教導，卻因為欠缺師資而無法成為廣泛的身體訓練方式。<sup>21</sup>比較具有成就的反而是學校外的武術會，特別是精武體育會的成立與對武術的傳播作用。這個以健身報國為名成立於上海的武術會，從 1910 年代起就成為傳統武技傳散的重要管道。透過各省分會的成立與精武會員赴學校社團的義務教學，一個新的保存國粹氣象也漸次在各地出現。暫不論魯迅對這種「新武術」和「中國式體操」的流風有怎樣的冷嘲熱諷，精武體育會的成立和它對各種技擊、拳術和傳統兵器的訓練與提倡，已經讓國術的操練成為強民的重要手段。<sup>22</sup>而精武會後來制定的會歌，也深刻顯露這種

<sup>20</sup> 見吳耀麟，〈中國青年組訓問題〉（上海：商務印書館，1944），頁 59-60 的記述。

<sup>21</sup> 見吳志濱，〈民國初年國術角色的演變與精武體育會的興起及啓示〉，《國術研究》，卷 2 期 1(1993)，頁 3-15，對於學校國術教學困難的討論。精武體育會的義務支援，雖然解決部份學校的師資問題，但整體來說，問題依舊嚴重。

<sup>22</sup> 關於魯迅對打拳的批評，見雜文 37，《魯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6），卷 1，

強民思維所隱含的國族情結：「國不強兮報毀滅，人不強兮難自立！振我精神，鍛鍊筋骨，充我知能，堅我魄力，百練此身如鋼鐵，任何威武不強屈！大家齊步伐，厲行三達德，起民疲！培國脈！大家齊努力，發揚『精武式』，衛黃魂！盡天職！」<sup>23</sup>這個事實說明，精武會的自願參與形式和非政治取向，或者說它獨立於國家部門的地位，並沒有讓它免除於國族情緒的干擾。某種程度上，國族的前途想像還是它能夠急速擴張，號召群眾以國術健身與自救的條件。這個主動的意義建構和共謀呼應，說明國族情結讓獨立於國家之外的社會團體也難逃國家理性的宰制。這是我們在觀察「尙武」的平民化發展時，不能不注意的問題。

如果說軍國民思潮的崛起有著以日本為師的想像和緣起，這個日本對中國的影響實際上並不止於思想的採介和討論。在許多軍事動作的教養上，她甚至比已經存在於中國的新軍，還具有廣泛直接的影響力。這種從想法到行動都深受日本影響的情形，不但反映在蔡鍔縱筆討論的「大和魂」上，藉以凸顯國魂對於國族生存的必要，同時也顯露在蔣百里翻譯的軍國民教育細則，以日本的實際做法來做為中國的參考。<sup>24</sup>兩者前後互補的討論，對軍國民教育在中國的發展具開疆闢土的作用，也是我們一般所熟知的軍國民教育在中國的發端。除了這種思想的演繹與討論外，軍國民教育在實作的層面上也深受日本的影響。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為體育與西式兵操等教練並非中國原有之物，而是外來的知識與體能技藝。在本地塾師和教員泰半無力教導這些課程的情況下，就近聘請日本的教習來中國任教，就變成解決這個問題的最直接手段。郭沫若的孩提經驗不但清楚證示這個問題的存在，同時也披露日本版的軍國民教育是如何

---

頁 309-310。原文發表於《新青年》，卷 5 號 5(1918)。關於精武體育會的成立經過，與詳細的發展歷史，見陳公哲（精武會發起人），《武術發展史：精武會五十年》（臺北：華聯出版社，1973）的有關陳述。

<sup>23</sup> 陳公哲，《武術發展史：精武會五十年》，頁 167。

<sup>24</sup> 有關軍國民教育與國魂培養的討論，見奮翮生（蔡鍔筆名），〈軍國民篇〉，《新民叢報》，號 1(1902)，頁 1-10 的陳述。蔣百里的譯文和其所造成的影響，見蔣百里，〈軍國民之教育〉，《新民叢報》，號 22(1902)，頁 33-52；黃金麟，《歷史、身體、國家：近代中國的身體形成，1895-1937》，頁 55-69。

在群眾圍觀中變成中國教育的一部份：

那時候的洋操真是有趣，在操洋操的時候，差不多一街的人都要圍集攏來參觀。那時候叫立正並不叫立正，是叫「奇奧次克」，叫向右轉是「米擬母克米擬」，向左轉是「西他里母克他里」，走起腳步來的時候便「西、呼、米、西、呼、米」的叫著。大家都莫名其妙，只覺有趣，又覺得好笑。這些很奇怪的口令在當時的人自然覺得是真正的洋貨了。<sup>25</sup>

這個由日本教習以日語發聲教導的兵操動作，清楚揭示軍國民教育在實施初期的日本作風，以及在當時所受到的高度關注和興趣。當然，軍國民教育所涉及的並不只是一種「國魂」的教養而已，它還包括肉體的教育與訓練。這種對肌肉的制式教育與凝視，是過去的社學和塾學體系全然沒有的。<sup>26</sup>

以一個共時性的角度來觀看，我們將發覺二十世紀初葉的中國是一個十分講究軍事紀律的時代。新式陸軍的建立和它所要求於軍人的嚴明紀律，正以快速的步伐和制度化的格局在軍隊中擴散。而在社會中，特別是學校體系，則有軍國民教育按部就班地實施，和武術教育在省市間流傳。雖然軍國民教育的發生和新軍的建立沒有直接的關係，但兩者在實踐的層次上都以德國操典做為版本，對個體進行身體的訓練。其表現在步法、手法、陣法，和口令訓練上的一致，甚至在 1917 年後臺灣公學校所實施的兵式體操，如徒手分隊、行進與踏步訓練等，看到類似的情景。這種同時並行的身體軍事訓練，說明軍事化和紀律化的身體表現已經超越空間的區隔（如軍營與學校）與對象的差別（軍人與學生），成為二十世紀初葉中國兵民共同經驗的過程。如此深度地交集，讓我們不能再將新軍與軍國民教育當做是兩個互相獨立的領域，或兩條平行的軸線來看待。因為孤立化的認識將使我們無法對軍事化身體在近代中國的誕生，進

<sup>25</sup> 郭沫若，《少年時代》（上海：海燕書店，1949），頁 44。

<sup>26</sup> 這個聲稱沒有否認中國以「六藝」（禮、樂、射、御、書、數）和「六儀」（祭祀、賓客、朝廷、喪紀、軍旅、車馬）來教養身體的傳統，但在缺少制式教育的條件下，不易普及，更談不上標準的要求與訓練。



行整體性的分析。

不過從這兩者並存與武術教育的邊陲作用中，我們看到武化身體的誕生，涉及的不只是一個機能的訓練與技藝的內化。在強調新軍的開創作為時，我們也不能忽略「鼓民力」和「尙武」等思維，對於建構武化身體的正當化作用。沒有這些意識形態和正當性的鋪路，武化身體不會如其所如地在中國展現，並成為歷史發展的焦點。當然，在這些肉體和精神的鍛鍊上，我們看到身體歷史的複雜。它不是單一力量或意圖衍生的結果，而是一個歧出多端的歷史演變結果。以小站做為身體建構的起點，只是要凸顯其中的軍事色彩與軍事目的。它不是武化身體的所有發端，這是作者需要加以說明的地方。

而從軍國民教育的持續進行，與黃埔軍官學校在 1924 年的成立，我們也看到這種信賴和講究並沒有隨著新軍質變而終結。相反地，新軍變質成為軍閥的私人武力，反而讓素以建立民國為職志的孫中山更加確信，建立一支紀律嚴謹和富有使命感的軍隊，是打倒軍閥重建民國的不二法門。為了完成這項革命事業，孫中山不但親自主導黃埔軍官學校的創辦，同時還要求所有入學的學生必須以革命做為畢生志業，以實現三民主義的理想與建國大綱的步驟——即軍政、訓政與憲政的建國三步驟，做為自我的目標。在這個行動座標下，學生不但要接受陸軍的所有基本訓練，以應付東征和北伐的戰事需要，同時還必須對國民黨的主義與主張有透徹的理解與服膺。為了達到這個目的，黃埔的學生不但必須接受諸如步兵操典、戰術學、兵器學、交通學和軍制學等學科知識的教養，同時還必須進行制式教練、實彈射擊、戰鬥教練和行軍宿營等軍事技術的實地演練。<sup>27</sup>與此同時，黃埔還採用蘇聯紅軍的組織方式，在學校中設置黨代表，直接主管軍事成員的政治教育工作。這個因為「聯俄容共」政策而衍生出來的制度設計，讓黃埔走出一條不同於新軍和其他軍校以德國為藍本的單純軍事教育路線，也讓黃埔的訓練多了一些軍國民教育所沒有的革命色彩。「怒濤

<sup>27</sup> 有關黃埔一到三期學生的軍事教育訓練內容，見黃振涼，《黃埔軍校之成立及其初期發展》（臺北：正中書局，1993），頁 227-236 的分類說明。

澎湃，黨旗飛舞，這是革命的黃埔！主義須貫徹，紀律莫放鬆，預備做奮鬥的先鋒……」，這首充滿自勵與革命色彩的黃埔校歌，清楚醒示黃埔的職責與努力方向。黃埔刻意側重政治教育，以三民主義、帝國主義解剖和社會進化史等課程，來培養學生的愛國意識與反帝立場，就是爲了要讓武力的行使不致逸出國民黨的政綱和指導，使武力成爲革命理想的踐履者，而不是反噬者。

這種政治與武力的主從關係配置，以及從而形成的使命性身體建構，是黃埔所以能在近代中國扮演關鍵地位的主要原因。而它在軍事上的成功，特別是北伐戰事的順遂，也證明了一個事實：近代中國的命運改變和國祚維繫，只有透過紀律與軍事化的身體才有可能成功，而這種紀律與教化的開展則必須受到主義的指揮與教導，才不會重蹈新軍擁有武力與濫用武力的覆轍。這種透過政治教化力量來保證武力的不致質變，是黃埔呈現的特點，也是它不同於新軍和其他軍事學校的地方。黃埔的三年建軍(1924-1926)和其造就的全國統一，顯示主義與軍事的結合，以及由此而產生的軍事身體建構，對中國的前途與命運具有重大的轉變作用。這個事實的發生和對這個事實所造成的效果相信，導致國民黨在 1927 年獲得政權後，積極推動軍訓成爲國家教育的目標。

從以上的討論中，我們可以清楚看到，軍事化的身體建構其實是早於國民革命就開始的歷史過程。它不是建國大綱議定軍政時期的產物——即以武力掃除所有革命障礙與橫逆，以進入訓政時期的準備階段，更不是國民黨執政後的創舉。它可以直溯到新軍與國民論述和軍國民教育在中國的推行。而此制度的推行和知識引進，又和當時西方的國防經濟思維與總動員作戰，以及國際競爭情勢緊密地關聯。拉長時間和推廣觀測角度，可以讓我們對新軍與軍國民教育出現後的身體建置，特別是其中牽涉到的軍事身體技藝訓練，有更清楚的掌握。不過即便是有這樣的背景存在，在面對「軍訓」制度化發展時，我們還是必須要質問，爲何在 1928 年國民黨以軍事武力統一中國，並結束軍政時期後，卻還要經由大學院決議，讓軍訓成爲所有中等以上學校的必修課程，這一切究竟所爲何來？這和 1928 年後國民黨政府所面臨的挑戰，有甚麼重要的因果率

連？對這些問題進行深度的思考，將可以讓我們對軍訓的誕生及其後續效應，有整體的認識。同時，也可以讓我們瞭解到 1950 年後施行於臺灣的軍訓體制，其實只是延續 1928 年國民黨統治中國時的措施而已。然而，就如同新軍和軍國民教育運動一樣，它們都不應該被視為是身體養成的必要和普遍條件。它們只是國族和主權意識高漲下的產物而已，這是我們必須加以瞭解的地方。

## 軍營外的「軍營」

就在軍事委員會提出「中等以上學校軍事教育方案」（1928 年 5 月），並隨後在國民政府中成立訓練總監部（1928 年 11 月），主辦高中以上學校軍訓教育事宜時，國民黨中央常會也在同年 10 月制定並通過了後孫中山時期最重要的「訓政綱領」條文。按該綱領規定，訓政時期的政權應該由國民黨全國代表大會代表國民大會來行使。在全國代表大會閉會期間，政權則付託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來執行。而所謂的治權（即行政、立法、司法、考試和監察等五權）則由國民政府總攬執行之。但關鍵的是，國民政府必須受國民黨執行委員會政治會議的指導與監督；而有關國民政府組織法的修正與解釋，也必須由這個政治會議來議決。<sup>28</sup>這個集政權和治權於一身的議決，對後來國民黨所進行的一黨訓政、一黨專政工作，實具有無比的重要性。也在於這兩者具有高度的時間重疊性，讓我們必須對軍訓的實施與訓政的開展進行重新評估，因為它們之間可能存在我們未曾留意與理解的關聯。

就 1928 年國民黨面對的政治現實來說，這兩個動作的幾近同時發生，其實並不是時間上的巧合。它們的出現反映這個新起的統治勢力，正企圖以各種方式來強化其對中國的統治，使國民革命的宣言和成果能在它的領導下彰顯出來。這種試圖將國體落實與身體改造連結起來的努力，在 1928 年後隨著北伐

<sup>28</sup> 有關綱領的詳細條文，見《革命文獻》，第 76 輯，頁 76-77。至於訓政所引發的各種爭議、暴露的困難，和其中所經歷的從「天賦人權」到「革命民權」的歷史變易，見黃金麟，〈革命／民權：訓政的敘事建構〉，《清華學報》，卷 27 期 4(1997)，頁 459-492。

完成，有愈發急迫的趨勢。除了進行體制的建構與武力的掌握外，這個統治如果要能獲得實現，還必須落實在對人民身體與生活的有效管訓上。而軍訓與訓政的推行正是要完成這個艱難的二體合一工作。當然，如果我們將時間稍加拉長，1934年國民黨主導，由新生活運動總會負責籌劃推動的新生活運動，其實也是在這個軌道上繼續進行國家對人民身體與生活的領導工作。正由於軍訓的發生是處在這樣一個關鍵時期，我們不能再將軍訓的創立、籌劃和實施當做孤立的事件來看待。因為單純、劃地自限式的討論，不會讓我們對軍訓的施行有宏觀、跨越事件脈絡的認識。

將軍訓與訓政的推行掛鉤，所反映的規訓事實可以在訓政和軍訓的各自作為中清楚發現。表面上的差別，並不代表兩者沒有深層的呼應與聯繫。以訓政體制的建立和推行來說，這個由國民黨依照孫中山的意志與遺命所形成的統制形式，在1928年後成為南京政權統御國政與治理人民的主要依據。在施行的過程中，國民黨人也一直以「政治保姆」的角色來看待自己的地位，希望透過三民主義的教義以及各種教化管道來提升國民的政治意識與水平，使憲政的實施能在人民具備自治能力的基礎上獲得實現。這無疑正是孫中山畢生努力想要完成的理想，也是國民黨的重要使命。然而，由於訓政的理念本身就是具有排他屬性的產物，一個不能抽離於「軍政、訓政和憲政」必須漸次發展的建國設計，這使得它的發展在一開頭就帶有強烈的排斥異論色彩。梁漱溟等人所支持的鄉村建設和鄉村自治運動，在1930年代遭受疑忌與軍事鎮壓，以及余日章等人所推行的公民運動在1929年後迅速沒落，被新起的黨化教育所取代，都說明這些「由下而上」的訓育人民方式，並不為國民黨的「由上而下」訓育方式所容忍。

國民黨之所以會採取這種定於一尊的訓政方式，和辛亥革命後的連串失敗有著密切的關聯。孫中山放棄天賦人權，改採革命民權的舉動，以及援引列寧式的政黨經營來改造國民黨，仿效紅軍成立黃埔軍校等，就是為了對這種失敗有所回應，並避免重蹈民國初年「革命成功，而革命黨人乃紛紛見殺於附和革

命、贊成革命之人」的危險。<sup>29</sup>所以當 1928 年國民黨以軍事手段取得國家政權時，它所要做的，並且實際做的，就是以軍事武力為後盾，以一黨專政和訓政的方式來實施訓化人民的工作，並禁絕其他訓育方式合法存在。這種壟斷身體教化的企圖，以及企望透過身體的政治化與主義化來達到萬眾一心的舉動，明顯表露在國民黨有關身體訓育的言說上。以 1930 年國民黨中央常會所通過的學生團體組織與學生自治會組織的各式章程來說，都清楚規定：「本三民主義之精神作成學生在學校以內之自治生活，並促進其智育、德育、體育、群育之發展」。在這種精神的指引下，各級中等學校更須進行「改革教學訓育分立制度；勵行師生共同生活，注重人格感化；根據黨義運用各科教材，訓練學生思想；矯正教師忽視訓育責任之觀念」的教化工作，以使主義化的人身發展能在學校教育中得到切實執行。<sup>30</sup>具體措施包括：在教室內懸掛國旗、黨旗、總理遺像與遺囑，同時舉行總理紀念週和教授三民主義等課程。這種一面以三民主義為本，強化學校教育對學生群體的意識教化，一面以軍事和政治手段禁絕其他訓育方式的可能發展，是國民黨在當時採取的策略，其目的就是要造就所有人民成為三民主義的信徒。

當然，從結果來看，訓政並不能算是成功的政治教化過程。除了沒有按照規劃在六年內完成行四權、清戶口、立機關、定地價和設學校等工作，以還政於民外，三民主義教育的僵化施行和聖典化、教條化發展，也讓訓政變成一個高壓性十足的舉措。對許多人而言，訓政是一個剝奪公民權與思想言論自由的過程，而不是一個賦予公民權的過程。1930 年代初期出現的「民主與獨裁」論戰，就是針對這個訓政方式所做的一次檢討。它的爭鋒相對言論顯示，中國知識界對於這個新起的共和國究竟應該以專制獨裁的方式來建國，還是以「幼稚園式」的民主憲政來教育人民，以建立富強的基礎，其實和執政當局有著十

<sup>29</sup> 孫中山，〈與吳敬恆論草定元勳公民意義書〉，《國父全集》（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73），冊 3，頁 316。原文發表於 1914 年。

<sup>30</sup> 有關訓政時期學生團體組織原則與自治會的組織大綱和施行細則的條文，見李相勗，《訓育論》（上海：商務印書館，1935），頁 295-301。中等學校教訓合一的試行辦法，見同書，頁 306-310。

分歧異的看法。「憲政是憲政的最好訓練」，「學游泳的人必須先下水，學彈琴的人必須先有琴可彈」，這個入木三分的批評，事實上已經凸顯出訓政所以成爲憲政施行絆腳石的原因。<sup>31</sup>而 1935 年出現在《國聞週報》和《獨立評論》上，對於訓政實施六年後還毫無具體成果的連番批評，也說明訓政並沒有成爲訓練人民行使政治權利的實際過程。

如果不以成敗來論是非的話，我們將發現訓政所欲完成的政治目標，其實與軍訓所欲達成的國民身體改造，有著十分近似的肌理。前者試圖以政治手段和意識教化來達到「國」與「民」的結合，形成以國統民的政治效應；後者試圖以軍事訓練和紀律要求的方式，來達到舉國皆兵和民爲國用的目的。這個深層的相似與呼應在 1928 年後，就一直成爲國民黨的重要政治工作。軍訓體制的建立和佈置，就是爲了讓這種國家凌駕於人民，並爲人民所忠誠信服的格局，得到制度上和身體上的保證。1928 年全國教育會議的宣言，清楚表明軍訓在當時所以必要的原因：「爲要鍛鍊青年身心，養成紀律服從負責耐勞習慣，提高國民獻身爲國的精神，增進國防的實力，[本次會議]鄭重通過了實施軍事教育的議案。凡高中以上學校，應以軍事教育爲必修科（女生應習看護），由大學院請軍事委員會派遣正式陸軍學校畢業的軍官爲教官，每年暑假期內，各校學生應受三星期連續的嚴格軍事教練」。<sup>32</sup>很顯然地，這種獻身爲國的精神與能力培養，是大學院所以採納軍事委員會的建議，實施全國性軍訓教育的主要原因。

在軍事委員會所提出的軍事教育方案中，我們可以清楚看到一個以黨國爲主的身體訓練方案，正透過教育體系的支持與軍事單位的配合，成爲全國中等以上學校學生的必修課業。不同於軍國民教育的是，這一次的「全民皆兵」教育不是由知識分子所發動，而是由國民政府的中心部門所主導。在軍事委員會的主導與教育部的配合下，影響個人身體發展深遠的近代中國軍訓教育於焉形

<sup>31</sup> 上述對訓政的批評，見胡適，〈從一黨到無黨的政治〉，《獨立評論》，號 171(1935)，頁 11。

<sup>32</sup> 教育部軍訓處編，《學生軍訓五十年》（臺北：幼獅文化事業公司，1978），頁 37。

成。1928 年的方案雖然無法涵蓋後續軍訓教育的全部發展樣貌，但已經清楚顯露這個教育的最終企圖，以及所應進行的諸般工作。對這個起源的掌握和瞭解，可以讓我們對軍訓工作的發展有一個不是全面、但卻切中要害的理解。以這個方案的內容來說，它涉及的並不只是軍事動作、技藝和知識的培養而已，其中還包括濃厚的意識形態教化。而且隨著時間的進入 1930 年代，意識教化的色彩有越加濃厚和強化的趨勢。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為 1930 年後共產黨的蘇維埃政權，已經對國民黨的南京政權造成不小壓力。在此情況下，加強受訓學生的三民主義教育和信仰，以形成可能的公共意志(*general will*)就變成絕對必要的工作，否則軍訓結果造就的可能不是一批體魄強健的愛國志士，而是一群蘇維埃的跟隨者。這種警戒和壓力是造成蔣介石所以一再要求軍訓不能脫離三民主義而施行的原因。1931 年 9 月，國民黨通過「三民主義教育實施原則」，就是爲了要進一步強化這兩者的關聯，同時使三民主義的內容變成公共意志的主要範疇。<sup>33</sup>

回到軍事技藝與知識的講求來看，軍事委員會所提的方案顯示，新起的軍訓教育並不是突然的奇想，也不是蔣介石和其幕僚的個人設想。這雖然和國民黨的統治需要有關，但也和軍國民教育的發展脫離不了關係；稍有不同的是，它比後者更強調戰鬥技能的培養與訓練。以方案中的第一案「中等以上學校實施軍事訓練案」來說，它所要求於學校的訓練工作，如加強運動和體育、練習兵式操、舉行星期遠足、教導軍事知識、學習看護、教導軍事地理和民族競爭史，以及多讀鼓勵勇氣的文章等，只是蔣百里的譯文在 1928 年的再版而已。<sup>34</sup>

<sup>33</sup> 這個「三民主義教育實施原則」的主要內容有：小學應以三民主義做爲編訂全部課程的中心；中學則以確立青年的三民主義信仰，陶冶國民道德爲目標，在初中實施童子軍，在高中實施軍訓與看護實習；高等學校和師範教育也應以實現三民主義的使命做爲教育的宗旨，俾使三民主義成爲統合全國人心的妙策良方。

<sup>34</sup> 軍事委員會所提的方案其實包括三個部份，分別是朱經農等提出的「中等以上學校實施軍事訓練案」，外交部提出的「中等學校實施軍事教育案」，和軍事委員會本身所提的「中等以上學校學術科教育要目表」。這三個提案經過教育會議討論後，合併成爲「中等以上學校實施軍事訓練案」，此即後來實行軍訓的主要法令依據。各個提案的內容，見張芙美，《中華民國臺灣地區軍訓教育發展之研究》（臺北：幼獅文化事業公司，1999），頁 19-24。

較爲不同的是外交部和軍事委員會的提案內容，其中有關軍人生活的鍛鍊和戰鬥技能的教導部份，對於此後中國學生的身體紀律發展具有深遠的制度化影響。而也在這個部份上，我們看到 1950 年後施行於臺灣的軍訓教育的原始面貌。首先是軍人生活的歷練部份，它要求學生的日常生活、飲食和起居等，都必須參酌軍營中的規定來進行；不問寒暑及假期，學生在校時一律穿著短式校服；而學校的管理和訓育也必須以軍營的制度來辦理，學生每日清晨必須進行徒手和器械體操一小時。而在軍事戰鬥技能上，軍事委員會的提案幾乎是照搬軍隊的操練方式來訓練這些學生，希望他們能透過這些操練而成爲一支勁挺有力的學生軍。它的九個訓練科目，如執槍教練、部隊教練、技術（如體操、刺槍、擊劍）、射擊、部隊指揮、軍隊勤務、測圖、軍事講話和其他包括兵器修補保存與衛生急救等，幾乎和軍隊的制式訓練毫無差別。這種企圖和對待顯然已經抹除學生和軍人身分的差別，使前者直接成爲後者的預備部隊。1929 年後，這些攸關學生身體訓練的規章雖然多有增減和修改，但把學生當成軍人來訓練的基調並沒有改變。隨著中日戰爭的爆發與八年抗戰的進行，這個身分和訓練上的混同，正以有增無減的態勢生存於國民黨和共產黨所控制下的中國。

除了軍事和戰鬥技能的訓練外，軍人生活和軍營制度的落實也是軍訓制度實施的重要工作。1936 年，由教育部和訓練總監部所頒佈的「高中以上學校學生軍事管理辦法」，清楚顯示起自軍國民教育的想法在經歷二十年的推展後，終於讓中國的學校正式走上軍隊化管理的路徑，成爲一個軍營外的軍營。這個共分十四章九十八條的管理辦法，就是要將學校軍隊化，使學校的組織、學生的服裝、請假、外出，和教室、食堂、操場與野外的活動等，都能以軍隊的作息方式來進行。除了成立軍事訓練團來訓練學生外，這個辦法還要求學校設立衛兵，負責對學生進行風紀稽查工作。由於這些條文對理解此時的身體訓化工作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而且也是 1950 年後臺灣學校進行軍事化身體管理的重要藍本，因此我將他們摘錄出來。這個從衣著到作息均有詳細規定的辦法，清楚顯現軍事化作爲和整齊、紀律的關聯：



一、全校教職員穿著素色中山裝，工友著工作服，學生夏季著土黃色斜紋布，冬季著黑色呢或黑色棉布中山裝。軍用輪胎式帽附青天白日黨徽，衣領要佩掛紫銅色領章，左邊為校名，右邊為號數，上衣口袋上緣佩戴團隊符號。黃色腰帶，綁腿，黑色運動鞋或膠鞋或皮鞋，黑色襪。

二、學生在室外一律向師長行軍禮。上課或上操時值日生要發「立正」、「報告人數」口令；上課則再發「坐下」口令；下課時發「立正」口令；下課發「解散」口令。

三、學生起居、操課均以號令為準。每日早晚舉行升降旗典禮，學生因病、因事不能到校要辦請假手續，外出時要注重服裝、儀容、禮儀。

餐廳進食要依口令，閉口細嚼，不自備私菜。寢室須保持整齊、清潔，非睡覺時間不得躺臥床上。<sup>35</sup>

這些冗長細密的規定，一旦執行，將使得學校和軍隊成為紀律化人民身體的最有效連結體。而軍訓的施行和戰鬥教練，就是為了要讓這種紀律化的效果在國族的生存上獲得體現。

不過在做歷史檢視時，我們也不能忽略軍事化教育在校園中遭遇到的抗拒。不同於 1919 年學生主動要求學校實施軍事教育，1920 年代晚期的學生對於軍事教育已經產生敬而遠之的態度。學生的消極反應和抵抗，清楚說明實施軍訓體制和愛國教育，其實並不像國民黨所預期和規劃地那般容易進行。以羅家倫的經驗來說，他在 1928 年任清華大學校長時，曾試圖以學術化、民主化、紀律化和軍事化為標的主導校務的發展。然而以軍事操演來帶領學生的方式，卻不為學生所接受。「每天早上上早操，校長和教務長都穿軍服，腳登馬靴，腳後跟還有馬刺子。」學生們剛開始還對這個早上六點鐘的早操有點興趣，「可是夏天過後，白天越來越短，天氣越來越冷，學生們來上早操的就越來越少了。

<sup>35</sup> 引自張美美，《中華民國臺灣地區軍訓教育發展之研究》，頁 59。

羅家倫下了一個命令，說是早操無故缺席，記小過一次……三次大過就開除學籍。下了這道命令，學生們還是消極抵制，後來連他自己也覺得行不通，就不了了之，早操於無形中取消了。」<sup>36</sup>這個在馮友蘭眼中徹底失敗的軍事化要求，說明身體的軍事治理並不是一個容易進行的工作。除了來自身體本身的抵制和反彈外，物質條件與愛國情緒的當下發展，乃至流行於當時的個人主義和自由主義等，也都會影響到這個治理工程的進行與成效。

當然，要從現有的條件去斷言國民黨的成敗，其實並不容易。雖然 1930 年代發生的剿共戰爭和中日戰爭，以及實施軍訓卻面對經費、設備和師資欠缺，乃至身體的抗拒等，都讓這個軍事措施在國民黨統治大陸時期無法全部實現。但無可否認的是，它們的規劃和經驗學習卻為 1950 年後實施於臺灣的軍訓制度，樹立一個法制和實作的基礎，使國民黨能在遷移臺灣後迅速實施軍訓制度，並以此來塑造一批反攻復國和冷戰所需要的新兵。這個「失之東隅，收之桑榆」的發展，讓我們很難斷言軍訓只有失敗的一面。而軍訓體制中所隱含的軍國民教育遺風，這個從 1902 年就開始生根於中國的日本產物，也讓它能夠毫無阻礙地承續日本殖民政府在臺灣所遺留下來的軍訓產業，並將它繼續加諸在個人身上。這種以國為主的規訓親近性，以及相同的歷史起源，說明從日據到國民黨時期的軍事化身體發展，並沒有因為政權更迭而產生斷裂，這是我們在觀察臺灣的身體發展時必須注意的部份。

## 「智仁勇」的身體

就在軍國民教育如火如荼地在中國開展的同時，一個新起的身體教養方式也正在中國崛起。由英人貝登堡(Robert Baden-Powell)在 1907 年所創辦，並隨之由嚴家麟（武昌文華書院英語教師）所引入推廣的童子軍教育，是我們在討論近代中國的身體發展時不能不顧及的對象。因為從 1912 年之後，它就成為

<sup>36</sup> 馮友蘭，《三松堂自序》（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9），頁 336。

許多教育界人士競相投入的對象。在他們的熱衷推動下，許多和童子軍教育直接相關的聯合會和研究會迅速在上海、廣東、南京、北京、天津、漢口和福州等地出現，而「智、仁、勇」三字也在鼓吹下，取代貝登堡的「準備」(Be Prepared) 二字，成為中國童子軍身心發展的座右銘。這個在當時和學校體系並存的組織，構成國家體制外訓練身體的重要場域。當然，這種訓練方式的引進和它所被賦予的社會職責，也讓我們再次意識到，1910年代的中國其實是一個深富國族意識與利益思考的時期。由於沒有先驗的標準可供對照，因此造成各種救國手段和言論競相浮現於檯面。這也就是為甚麼軍國民教育已經成為學校教育的主流時，還會出現提倡童子軍教育和廢兵主張的原因。而新文化運動(1915-1923)所引進的諸般思想和主義，更是讓當時的知識論域充滿著彼此呼應或對立的聲音。這種現代性在中國的再現，以及它所造成的認知混亂，是這個時代的重要特質。不過，在這些紛陳雜沓的聲音之下，一些影響深遠的訓育活動也正在中國埋頭進行，軍國民教育和童子軍教育就是其中最為持久的兩個。它們之所以如此長命的原因，在我後續的討論中會有清楚的交代。

與軍國民教育高度類似的是，童子軍教育也是透過知識分子的主動引介才進入中國的教育場域。在被國民黨所收編(1928)，並透過教育部通令全國成為初中和同等學校的必修課程(1935)之前，它都是由各地的童子軍聯合會和研究會負責主持推動，其中也不乏教會學校的積極參與。這種獨立、自願的個人參與，以及區域組合(如最有影響力的上海中華童子軍會與江蘇省童子軍聯合會等)，是童子軍出現在中國的最初樣態。雖然童子軍所講究的是課外、志願的參與與訓練，但由於童子軍所講究的技能和生存訓練，如露營、生火、結繩、旗語、斥候、測量、偵查和救護等，與軍國民教育所期待於個人的身體訓練有著呼應性的關聯，甚至更能具體表現出軍國民應該具有的能力與訓練，因此也深受教育界的青睞。另外，童子軍所要求於個人的禮節、負責和服務精神，也與軍國民教育強調的「對國家的義務」沒有衝突。這種表裡一致的親和，也是它能在1912年後迅速擴張的原因。

正因童子軍具有對自己與對他人負責的精神，而它對個人身體的紀律訓練與要求，又有實際增強武備的效用，以致它的發展深受當時處在南方，埋首準備革命的國民黨的重視。這個企圖挪用童子軍訓練的動作，在 1926 年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的決議成立童子軍委員會上，有清楚的表現。按當時青年部的建議，國民黨所以必須介入童子軍教育，甚至將它三民主義化的理由有：

- 1)童子軍教育為學校青年最重要之課外教育；
- 2)童子軍教育尚任俠、主實行、重紀律、有組織、最富於革命性；
- 3)童子軍教育不但為民眾武裝之前導，且可站在戰線上負警備之責；
- 4)本黨於青年運動中，必須注意此影響青年之偉大力量，而以本黨所負之使命，灌輸於童子軍之中。<sup>37</sup>

隨著國民黨北伐的成功與政權的確立，這種企圖黨化或三民主義化童子軍教育的動作也越加強大。最明顯的是，除了在 1928 年成立直屬黨中央的童子軍司令部，以主導全國的童子軍組訓事宜外，國民黨也透過教育部在 1929 年公佈中小學童子軍科目（此時尚不計學分）。自此，過去以各地教育會、童子軍聯合會、研究會和學校為基地的地方童子軍組織，以及它們所具有的活動、訓練和規定誓詞的自主性，開始喪失其自由空間。<sup>38</sup>因為在國民黨的主導下，強調統一的，以國家生存和主義實踐為取向的訓練綱要，在 1933 年後正式成為全國童子軍的訓練範本。這個對於童子軍誓詞、規律、銘言和各項課程訓練都有明確規定的訓練綱領，讓童子軍教育和中國命運迅速結合為一，使前者承擔一個未曾有過的深重使命。以童子軍的誓詞來說，「某某誓遵奉 總理遺教，確守中國童子軍之規律，終身奉行下列三事：第一，勵行忠孝、仁愛、信義、

<sup>37</sup> 上引文係吳耀麟按青年部的提案所作成的摘要，見吳耀麟，《青年訓練之理論與實際》（上海：商務印書館，1946），頁 26。原文見 1926 年 3 月 5 日，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在廣州的第十次常務會議紀錄。在這次會議後，兩廣的童子軍就在其原有課程中增加黨義教材，並重訂童子軍的誓詞和規律，正式開始三民主義化的童子軍教育，而這也是訂每年 3 月 5 日為童子軍節的由來。

<sup>38</sup> 1932 年教育部公佈中小學課程標準時，才開始賦予童子軍兩學分的地位。見臺灣省政府教育廳編，《臺灣教育發展史料彙編：訓育篇》（臺中：臺灣省立臺中圖書館，1997），冊下，頁 681。另外，有關國民黨主政時期的童子軍思想發展與公民訓練的潛在衝突問題，見 Robert Culp（高一涵），〈中國童子軍——南京十年童子軍手冊中的公民訓練與社會意識〉，《新史學》，卷 11 期 4(2000)，頁 17-63。

和平之教訓，為中華民國忠誠之國民；第二，隨時隨地，扶助他人，服務公眾；第三，力求自己智識道德體格之健全」，就清楚昭示「總理遺教」和「對國家的責任」，已然成為童子軍訓練的兩個重要方向。這個總理、國家、公眾和個人的位階排序，已經清楚說明童子軍的職責所在。而在童子軍訓練合格與否的標準上，由國民黨所制定的綱領，它的第一條規定就是「知道 總理生於何時何地；知道 總理革命思想的產生；知道 總理偉大的人格；知道 總理致力國民革命的目的；能背默和講解 總理遺囑」。<sup>39</sup>除此之外，包括黨旗與國旗的歷史、童子軍事略、三民主義要略和中國革命史略等，也都是訓練的必要項目。也就是說，中國童子軍除了必須具備貝登堡在其《童子警探》(*Scouting for Boys*)一書中，所述及的各種生活知識、技能與紀律外，還必須熟稔總理的事略和思想，以及國民革命的意義與理想。這種在意識和行為上黨化童子軍的動作，使中國童子軍自此難脫政黨勢力的支配和穿透。

上述現象說明，童子軍訓練在 1930 年後快速成為普及化的教育，與統治當局所賦予它的意義和地位實有著密切的關係。然而，在賦予政治發展空間時，這種工具化的運用和對待也讓童子軍無能走出一條獨立於國家或政黨支配的道路。1935 年，教育部通令全國各公私立初級中學，規定自該年開始「應以童子軍為必修科，修習時間定為三年，每年度每星期實施三小時，課內一小時，課外兩小時」，並要求「童子軍設備費應由各校列入預算內，做為經常費；童子軍在初中實施後，童子軍制服即為該校學校制服，不必另製制服」，就是企圖透過將童子軍列為長期的必修科目，來醞釀一個國家和政黨所需要的忠誠身體。<sup>40</sup>這個全面實施童子軍教育的政策，不但立即讓童子軍訓練從課外活動變成制式教育，同時變成國家教育經費的經常支出對象。在組織、訓練和經費皆受制於國民黨政府的情況下，童子軍教育的黨國化只是時間問題而已。

細究其實，童子軍教育所以從課外遊戲和活動的領域，變成中小學學生必

<sup>39</sup> 有關這些宣誓、要求和訓練的具體內容，見「中國童子軍訓練綱領」。此文件載於吳耀麟，《青年訓練之理論與實際》，頁 150-194。

<sup>40</sup> 吳耀麟，《中國青年組訓問題》（上海：商務印書館，1944），頁 72。

學的嚴肅知識，這個身分轉變和地位跳躍，與其所處時代有不可分割的關係。它不是貝登堡個人曾經預想過的結果，也不是嚴家麟等人在引進童子軍教育時，事先規劃的結果。它是一個政治現實、判斷和欲想共同型塑出來的產物。透過這個背景的掌握，我們知道，現在被稱為「世界唯一在初中列為課程的童軍訓練」，一個「我國政府獨具慧眼，不願避重就輕地隨波逐流，爲了要使全體國民在少年時都能接受此一完整的生活教育，而毅然列為初中課程，不論別的國家對之是如何的冷淡漠視」的努力，它的發生不是偶然。<sup>41</sup>童子軍教育的所欲和所能，以及它所造就出來的身體結果，才是它所以被看重的理由。蔣介石的欽定說法，以及其中所顯露出來的政治教誨目的，清楚說明童子軍教育在當時備受國民黨政府重視的理由：

成年國民應受軍訓，未成年的國民應受童子軍的訓練。童子軍與國民軍訓，在公民教育上是一條道路上的兩個階段……從前一般人把國民軍訓當做軍事部門的工作，把童子軍當做教育部門的工作。因此國民軍訓與童子軍不相關聯，並且互相輕蔑。我們今後要從公民教育的觀點上把兩者連貫起來，更望童子軍部門與教育部門密切合作，推進這兩階段的工作，以保持和增進國民身心的健康。<sup>42</sup>

這種試圖將童子軍教育變成軍訓教育的預備階段，從而形成「公民」訓練的效果，是國民政府所以不辭辛勞，甚至形成一個絕世僅有的全國必修童子軍規定的原因。這種站在黨國的立場，企圖透過童子軍和軍訓教育以練就國家生存所需要的身體，是我們可以在上述的動作中清楚發現的痕跡。若再加上訓政的推行，這個試圖以體制手段來形成身體與國體的合一，就變得更加明顯與複雜。當然，就歷史的發展結果而言，我們知道國民黨並沒有成功地完成這個計畫中的改造工作。它所面對的歷史局勢和客觀實力，以及個體身體本身所具有的自利取向，都讓這個企圖難於實現。<sup>43</sup>然而，轉化童子軍教育成爲意識形態

<sup>41</sup> 陳鐵，〈國中童軍訓練的實際問題〉，《中等教育》，卷 24 期 1-3(1973)，頁 56-58。

<sup>42</sup> 蔣介石，〈民生主義育樂兩篇補述〉，《蔣總統集》（臺北：國防研究院，1961），冊 1，頁 70。

<sup>43</sup> 除了缺少經費、訓練員，與學校的積極配合外，童子軍初期所留下的「爲富人奴」形象，也難

國家機器的努力，並沒有隨著國民黨在大陸的失勢而嘎然而逝。隨著國民政府遷臺，以國家為中心的「寓教於樂」作法，也隨著黨國重心的轉移而移植臺灣。在動員戡亂時期這個新戰時體制的翼護下，它再度成為國家教育的一環，擔負著組織和訓練青少年的工作。

就身體的國家化和軍事化發展來說，童子軍訓練只是這整個系列訓練中的一部份。它和軍國民教育、黨化教育、軍訓教育，以及訓政體制的建立，有一個相同的目標，那就是轉化人民的身體成為國家富強的基礎和工具。這種將童子軍教育工具化和民族化的發展，其實和貝登堡原始用意沒有太多出入。雖然在許多有關貝登堡和童子軍的討論中，童子軍教育一直被描繪為一種德行教育，或者說，一種透過實用知識和技能來服務人群，訓練公民的教育。然而這個以「非軍事化」和「非戰鬥性」做為重點的描寫，以及建立在這個命題上的眾多議論，並沒有完全反映童子軍的全部發展面貌。<sup>44</sup>這個持續將近五十年的正面刻寫，它所達成的區隔作用和論述效果顯然經不起歷史與政治現實的考驗。出現在 1920 年後的各種童子軍翻版（詳見下文），和它們的軍事化訓練內容，其實都和貝登堡的原始鼓吹與運用軍事技藝以訓練青年的身體，有著直接的關聯。《童子警探》一書中所隱含的愛國主義成份，與對國家的義務強調，

---

被社會接受。這個刻板形象一直要等到抗戰發生，童子軍投入救難工作時才產生根本改變。「從前我不知道曾經多少次想以最惡毒的話來咒罵那些童子軍的組織者，因為他們把那些天真的孩子，晒在烈日下，替『閩人』和『慈善家』們，做著小的臨時的家奴。我曾經有一次，因為看到一隊童軍參加了一個有錢人的喪儀，而始之以為他們做年輕的奴隸，終之於叫出『救救孩子』的呼號。」這個形象多少也影響到童子軍的被接受程度，以及家長讓孩子參加童子軍的意願。見〈他們做了切實工作〉，原載於 1937 年 8 月 31 日的《辛報》，輯於中國童子軍戰時服務第一團團史編輯委員會，《抗戰與童軍》（上海：大公報代辦部，1938），頁 26。

44 有關童子軍的創立與訓練，見 Robert Baden-Powell, *Scouting for Boys* (London: Horace Cox, 1908); Robert Baden-Powell, *Scoutmastership: A Handbook for Scoutmasters on the Theory of Scout Training* (N. Y.: G. P. Putnam's Sons, 1920) 兩書的鋪陳與說明。對於童子軍訓練的價值闡述，見 E. E. Reynolds, *Baden-Powell: A Biography of Lord Baden-Powell of Gilwell*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2); E. E. Reynolds, *Boy Scout Jubilee*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7); 與拉斯洛·那吉(Laszlo Nagy)著，胡品清譯，《兩億五千萬童子軍》（臺北：幼獅文化事業公司，1986）。有關童子軍教育應該和軍事與戰鬥訓練加以區隔，以及認為軍紀可以摧毀個性的宣稱，見 Laszlo Nagy 前引書，頁 43、61 對此論點的闡述。

也都昭示著這種潛在發展和轉變的可能。<sup>45</sup>這些事例說明國民黨收編童子軍教育，做為政訓和軍訓的管道，其實並不是特例，但它的發生卻讓民初略帶模糊的「智仁勇」訓練，在短期內變成以三民主義為中心的政治和軍事訓練。這個發展和軍事化身體在中國的形構，有著密切的因果關聯。

當然，如果我們將觀測的時間稍加拉長，一個和童子軍教育有著血脈相連的組織，一個對軍事化身體在中國持續建構有重要作用的組織，也是我們必須加以留意的對象。這個在 1938 年由國民黨所推動成立的三民主義青年團，雖然和中日戰爭的爆發以及中國的進入總動員，以對抗日本的侵略，有著重要的脈絡關聯，但三民主義青年團其實是一個在組織上，以童子軍做為原始模型的青年訓練團體。除了繼續講究三民主義的精神與教義訓練外，這個號稱志願性，但卻有一個「余誓以至誠，力行三民主義，服從團長命令，嚴守團章，執行決議……如違誓言，願受最嚴厲之制裁」誓詞的組織，它對於團員的身體軍事訓練也有偏執性的講究。<sup>46</sup>例如，1940 年，國民黨中央常務幹事會通過「三民主義青年團團員訓練方案」，其條文中就有十分細緻的初級、中級和高級軍事訓練要求。這個從軍事學科和動作，到單兵、班、排、連戰鬥教練都涵蓋的訓練方案，所要型塑的無疑也是一個標準的、能作戰的軍事身體。<sup>47</sup>1942 年，在四川灌縣所舉行的青年夏令營訓練，就清楚反映這個訓練方案在付諸實施後，對於青年身體所造成的鮮活影響。<sup>48</sup>當然，也在這些政治、體育、音樂和

<sup>45</sup> 1970 年代後，童子軍訓練中所隱含的國家主義色彩與軍事訓練成份開始成為學界議論的對象。這些較具批判性的檢視，讓我們看到童子軍的興起，其實與大英帝國的沒落，和貝登堡個人對於這種沒落的焦慮，有著深切的關聯。有關這部份的檢討，見 John Springhall, *Youth, Empire and Society: British Youth Movement, 1883-1942* (London: Croom Helm, 1977); Michael Rosenthal, *The Character Factory: Baden-Powell and the Origins of the Boy Scout Movement* (London: Collins, 1986); Robert H. MacDonald, *Sons of the Empire: The Frontier and the Boy Scout Movement, 1890-1918*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93)。

<sup>46</sup> 這份誓詞的全部內容為，「余誓以至誠，力行三民主義，服從團長命令，嚴守團章，執行決議，實踐新生活信條，為主義盡忠，為人民服務，不避勞怨，不惜犧牲，如違誓言，願受最嚴厲之制裁，謹誓。」引自吳耀麟，《青年訓練之理論與實際》，頁 67。

<sup>47</sup> 有關「三民主義青年團團員訓練方案」的詳細條文與規定，請見吳耀麟，《青年訓練之理論與實際》，頁 199-244。

<sup>48</sup> 見蔣翼振編，《三民主義青年團三十一年度灌縣青年夏令營訓練紀實》（成都：青年出版社，



軍事訓練的活動中，我們看到童子軍教育在中國的高度政治化發展。

上述情況說明，早在國民政府進行民國以來第一次義務兵徵兵行動(1936)之前，軍事化的身體教養，特別是新式以德、日、俄為版本的軍事操練，就在新軍的引領，以及軍國民教育等的配合下，堂皇登陸中國，並成為各界訓練身體的制式範本。經過長期持續不斷的努力，的確塑造了一個和湘、淮軍時期十分不同的身體紀律與表現形式。當然，做此比較時，我們也不應該忽略這兩者其實是處在十分不同的歷史情境內。這個在國族觀念、武器使用、動作教練，和時間與空間計算上都有截然差異的情況，是造成兩個時期產生兩種不同訓練的重要原因。與此同時，我們也必須留意，這個新起的身體訓練方式不只是一種訓練技藝的突破和改進。在其背後，還有合理化這種訓練的基本思想或現實存在。這些正當化國家對個人身體的統治，使軍事技藝成為身體構成「正常」要素的思想或現實，就是我們接下來要討論的對象。我希望藉此讓我們看到軍事化的身體是怎樣在這些理論與現實的支撐下，變成一個普遍的現實。

## 國防經濟學與身體

當然，如果將時間稍作拉長，同時將討論的界域略作放寬，我們將發覺起自晚清和國民政府這一系列武化人民身體的動作，其實與當時的國際潮流有著高度的連動關係。甚至在中國仿效的國家之間，也存在著互相學習的事實。這種承先啓後、左右交相引證的發展，和各民族國家在十九世紀中葉後所面臨的生存競爭有著直接的關係，而中國只是這個體系中的一員而已。在以下的討論中，我將透過童子軍在各國的變體，以及義務兵制這條線索，來觀視整體的發展。與此同時，我們將看到，這種國家對人民身體的壟斷，和普法戰爭的進行以及歐戰的發生有著綿密的因果關係。這是我們在思索中國的身體變遷時，不能略而不談的關聯。

---

1942），卷 2 和卷 3 對於各項活動與青年反映的記述。

在上文的討論中，我們已經提及童子軍教育和三民主義青年團在 1920 年代後，對中國身體所造成的關鍵影響。然而，這個以貝登堡的童子軍訓練做為範本的組訓身體動作，並不只出現在中國。除了原生地英國外，1907 年後它也相繼在美國和其他國家，發展成為組訓青年的重要方式。其中特別值得注意的是蘇聯、義大利、德國和日本等四個國家，因為在這些國家中，童子軍的組織和訓練明顯被挪做為國家機器的一部份，成為國家意志的延伸和執行單位。以蘇聯來說，1917 年的革命不但終結沙皇在俄國的統治，同時也結束了已有七年歷史以英國為版本的童子軍訓練。在滌除了其中的資產階級成份後，列寧和其門徒按照貝登堡的原始構想，組訓蘇聯的青年，冀望透過這種另起爐灶的方式，讓青年成為共產主義的踐行者。為了達到這個目的，蘇聯在 1918 年成立歷史上第一個共產主義青年團，並在隨後一年要求全體團員接受軍事訓練。1922 年，更以童子軍為仿造對象，在莫斯科的紅色普列斯那區成立少年先鋒隊，以實質的童子軍訓練來鍛鍊共產主義社會所需要的德行和身體。這個以列寧的名言，「組織兒童，這是教育共產主義社會的人的最好道路」做為註記的發展，並沒有隨著列寧在 1924 年的去世而終止，反而因為他的去世與更名少先隊為「列寧少年先鋒隊」，而更加緊密與擴張。在共產主義青年團的領導與提示下，「你們應當成為對得起你們旗幟上所寫的那個偉大的名字」的警語，一直成為少年先鋒隊日夜奉行的圭臬。<sup>49</sup>而 1924 年蘇聯所創辦的十月兒童團，基本上也是以童子軍的組織方式來訓練七到十四歲的兒童。這個以「準備著、時刻準備著」做為口號的兒童訓練，它的翻抄童子軍精神與訓練，甚至也可以在 1931 年後成立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清晰看到。<sup>50</sup>這一脈相承的發展，是

<sup>49</sup> 少先隊在組織上必須接受青年團的領導，而青年團則接受共產黨的指導，這樣就構成一個組訓青年和少年的綿密網絡。有關少先隊的成立和組織精神，以及 1949 年後對中國革命的推動作用，見團中央少先隊工作委員會、中國少先隊工作學會編，《少先隊工作手冊》（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84）；教育資料叢刊社編，《小學校的少年兒童隊》（北京：新華書店，1950）。上引文見《小學校的少年兒童隊》，頁 71-72。

<sup>50</sup> 在中國共產黨統領江西蘇區和其他蘇區時，「時刻準備著」一直是兒童團的主要訓練口號，這個源自蘇聯的產物 and 它所造成的實際效果，由於涉及的議題紛多，作者將以另文討論其間的變化和結果。

我們過去在研究蘇維埃體制或中國共產黨組織時未曾深入討論的部份。當然，它的出現也清楚證示，童子軍教育對中國身體的型塑並不全然來自國民黨，共產黨也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1949年後它更成為唯一的角色。

除了蘇聯之外，義大利和德國的翻用童子軍訓練，形成法西斯式的統治，也說明貝登堡的理念在歐洲所造成的寬廣影響。以墨索里尼在1926年成立的全國巴里拉(Balilla)團來說，它不但直接取代童子軍在義大利原有的組織和訓練，同時也將巴里拉的訓練歸屬於教育部，形成全國性的組訓青年活動。<sup>51</sup>除此之外，他也透過強制手段解散童子軍和其他青年組織，使巴里拉、狼子隊和法西斯青年團等成為唯一合法的青年和少年組織。1933年，貝登堡在拜訪墨索里尼後所做的公開評論，清楚證示他對於這種運動在義大利的蓬勃發展，以及所受到的國家支持，有著高度的評價。這種結合愛國主義與童子軍技藝的身體訓練，正是他想要透過童子軍組織來實現的結果。然而，隨著二次大戰的爆發，貝登堡對於巴里拉團的認同也跟著急速掉落：

墨索里尼解釋了他創立自己的童子軍的原因，說他的原則也是源自世界童子軍運動，然後他要我給他幾句評語。我回答說，他的童子軍運動是強迫性的、非志願的。它針對狹小的民族主義，而非促進國際間的相互了解。他的童子軍是純粹的體能訓練，並不發展精神層面。它不培養個人的人格，只發展群體精神。<sup>52</sup>

這種批評也適用於1925年開始組織的希特勒青年團。這個以童子軍做為

<sup>51</sup> 巴里拉是一位1746年奮力在熱那亞抵抗奧地利入侵的義大利兒童。墨索里尼企圖透過他的英魂昭示勇敢、熱心、和愛國的精神，並以此做為組訓義大利青年的精神支柱。有關巴里拉的介紹，見吳耀麟，《青年訓練之理論與實際》，頁48-49。與中國不同的是，巴里拉雖然歸屬於教育部，但它的訓練並不在學校中進行，而是在校外另行組織進行。見Elizabeth Wiskemann, *Fascism in Italy: Its Development and Influence* (N. Y.: St. Martin's Press, 1969), p. 38; Tracy H. Koon, *Believe, Obey, Fight: Political Socialization of Youth in Fascist Italy, 1922-1943*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85)。

<sup>52</sup> 有關貝登堡對義大利青年運動的評價，見Michael Rosenthal, *The Character Factory: Baden-Powell and the Origins of the Boy Scout Movement*, pp. 273-278。貝登堡對法西斯青年運動的觀念修正和評論，見拉斯洛·那吉(Laszlo Nagy)著，胡品清譯，《兩億五千萬童子軍》，頁96，原文發表於1940年。

基幹，並融合其他青年團的軍事訓練組織，讓國社黨可以透過青年團的訓練和號召，調動德國各地的青年和少年，以為國家之用。為了使青年及早認識個人對於國家的責任和義務，希特勒規定，德國男女青年自十歲起就可以參加德國少年團和少女團，十四歲後則參加希特勒青年團和德國女子同盟，以培養隨時準備為國犧牲的精神和能力。<sup>53</sup>1935年，德國內政部更通令各機關，凡1920年後出生的德國青年，若未曾受過青年團訓練，皆不得擔任內政部所屬機關的公職工作。而1936年年底的命令，「所有德國境內的德意志青年，必須參加希特勒青年團。在家庭和學校之外，德國青年必須接受希特勒青年團依照國社黨的精神，所進行的體能、精神和道德教育，以便服務於國家和人民」，更是讓青年團的訓練成為每個青年都必須經歷的生命過程。<sup>54</sup>這個事實說明，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一樣，都對青年的精神和意志發展，以及他們的體能鍛鍊，有著高度的關注和掌控。這種身心一體的訓練，是我們可以在共產主義青年團，乃至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的青年團中都看到的成份。

有趣的是，這種身心的政治和軍事鍛鍊，也是日本在1910年代後努力進行的工作。日本在1911年引進童子軍訓練，並以此改善原有的少年團和青年團組織，組成以町村、郡市等為基礎的大日本青年團(1915)，它的發展路徑和歐戰的發生，以及德國青年在戰爭中表現的勇猛、愛國和堅毅精神，不啻有著直接關聯。這種吾亦可為之的企圖，不但讓日本漸次走脫英國童子軍的發展路線，改以德國做為師承和學習的對象，同時也使得日本的青年團直接採用黃色軍服、黃色裹腿和黃色軍帽做為團員的制服。<sup>55</sup>這種直與軍隊無異的裝扮和陶

<sup>53</sup> 有關德國青年團的訓練內容和規定，見吳耀麟，《青年訓練之理論與實際》，頁139-143；Gerhard Rempel, *Hitler's Children: The Hitler Youth and the SS*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89)；Philip Baker, *Youth Led by Youth* (Doncaster: Vilmor Publications, 1996)，共三冊的圖文說明。

<sup>54</sup> 見Lawrence D. Walker, *Hitler Youth and Catholic Youth 1933-1936: A Study in Totalitarian Conquest* (Washington, D. C.: 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 Press, 1970), pp. 161-162 附錄的希特勒青年團規律。原文共計四條，本文所引者為第一及第二條。

<sup>55</sup> 按吳耀麟的考證，各國童子軍或青年團泰半皆以襯衫短褲做為制式服裝，日本青年團則以軍服做為制服，三民主義青年團則以中山裝做為標準服飾。見吳耀麟，《青年訓練之理論與實際》，頁71-72。有關大日本青年團的成立經過與訓練內容，見R. J. Smethurst 著，郭俊鈺譯，《日本

養，雖然不見得起自童子軍的引入，但兩者的親和發展與交錯生成也是我們必須注意的部份。

由以上的討論中，我們可以清楚看到，中國童子軍的黨國化發展和三民主義青年團的組成，並不是歷史特例。它們和這些前後並存的童子軍變體，其實有著高度的血緣近似性。當然也在這個普遍的發展中，我們看到貝登堡的訓練人身技藝，特別是他從軍事訓練中所提煉出來的規訓和發展身體技藝，經常成爲各種政治統治勢力企圖染指與介入的對象。這種壟斷、轉化、消滅或收編的發展，自然和童子軍所具有的組織與訓練效果脫離不了干係。然而，它們的出現也證明，貝登堡的智慧結晶並不是沒有危險性，甚或走上歧路的可能。儘管他自己不見得願意看到這種結果的出現，但從列寧到蔣介石等人的努力中，我們都可以看到這種挪用的結果。<sup>56</sup>很顯然地，這是一個持續不斷、跨地域和跨文化的發展。正因歷史是如此近似地走向這個方向，讓我們不能不對這種發展提出質疑：爲何這種使用和挪用童子軍的訓練會成爲二十世紀人身發展的大宗？它的出現和歷史的發展，以及人對這種發展的對應與想像，有甚麼實質的關聯？在中國的近現代發展過程裡，這種歷史的現實和對策如何使得武化的身體發展變成難於迴避的選擇？這是我們接下來要回答的問題。

要回答上述問題，進行去異求同的解釋是必要的。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爲從列寧革命後，對於童子軍的挪用或收編就在民主、共產、法西斯和以國民革命爲號召的國度裡分別進行著。這種齊頭並進的發展，已經不是不同主義的差別所能加以解釋的問題。它是一個跨越國度和意識形態差別的身體發展方式。我們不能用傳統的民主、共產、法西斯和三民主義的分類，來區別這個規訓動作。這個特定的發展和它所隱含的計算與訓育身體成份，是我們可以在這些主義的實踐中共同發現的成份。但令人好奇的是，這種發展是怎樣在二十世紀的初葉成爲身體發展的主要趨勢？是甚麼樣的歷史情境導致這種發展成爲

---

軍國主義的社會基礎》（臺北：金禾出版社，1994），頁 36-52。

<sup>56</sup> 就系譜生成的角度來說，1952年成立於臺灣的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事實上也是一個童子軍訓練的變體，它和共產主義青年團有著同根生的起源。有關這部份的發展，作者將以另文討論之。

一個普遍的狀態，從而造成中國撫拾列寧和希特勒等人的路徑，以童子軍和青年團來駕馭青年的身體？

以童子軍誕生後的歷史情勢來說，1910 年代的世界局勢，特別是歐戰的爆發和蘇聯革命的成功，無疑是造成這種跨國度和跨文化訓練的重要原因。歐戰不但讓歐洲主要國家相繼陷入戰爭狀態，形成資本主義文明高度發展後的自我毀滅。同時，戰爭的進程與結果也醞釀出新的作戰概念，那就是今後戰爭的勝負不見得取決於一個國家的軍隊動員能力，而是取決於它的總動員能力。德國的不敗於前線，而敗於國內缺乏工業、農業和組織動員能力，以及人民因為長期經濟封鎖而喪失鬥志，無以奧援前線，就是導致這個概念崛起的主要原因。<sup>57</sup>這種戰爭的勝負並不全然由戰場上的兵將和武器來決定，戰場外的國家經濟力、政治力和國民的素質，同樣對戰爭的進行具有最終決定力的想法，讓歐戰後各國相繼投入總動員的準備與研究。這種試圖讓舉國上下能夠在人力、物力與組織上進行戰爭動員的準備，是童子軍和青年團能夠在歐陸迅速擴張的原因。而歐戰後的利益劃分和政經情勢也加劇這種發展的力量。最明顯的是，凡爾賽合約的議定與其隱含的報復主義，讓戰敗的德國除了準備第二次戰爭外，別無其他選擇。因為按照英法等國的要求，「德人至少當在十五年內，為協約國從事工作，且戰前五十年中德國工商業繁盛區域，當皆為協約軍隊所暫時佔領，一切商船，均為協約國所有」。<sup>58</sup>如此威逼和報復無疑將使得德國的國民，終其一生成為英法的奴隸。歐洲自由報界在和會開議期間警告，「苟此約竟成為對德之最後條款，則吾人可以斷定其結果，即吾輩可將約文束諸高閣，而速從事於二次戰爭之準備」，顯然不是危言聳聽。<sup>59</sup>不過幾年，希特勒

<sup>57</sup> 見 Roger Chickering, "World War I and the Theory of Total War: Reflections on the British and German Cases, 1914-1915," in Roger Chickering and Stig Förster, eds., *Great War, Total War: Combat and Mobilization on the Western Front, 1914-1918*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 35-53.

<sup>58</sup> 羅羅譯自《美國評論之評論》，〈歐洲和會之結局〉，《東方雜誌》，卷 16 號 8(1919)，頁 19。  
<sup>59</sup> 原文刊於 1919 年 5 月 10 日之英國《每日新聞》，見羅羅譯自美國《國民》之〈歐洲自由報紙對於和約之批評〉，《東方雜誌》，卷 16 號 10(1919)，頁 19。事實上，歐戰的結果除了造成納粹政權的崛起外，也為墨索里尼的法西斯政權開出一條道路，以組訓青年來挽救義大利的危亡。

真的就以撕毀凡爾賽合約，恢復德意志民族的光榮做爲口號，召集青年從事國族重建運動。而這正是童子軍和青年團訓練所以備受希特勒等人青睞，甚至被德國青年接受的原因。

除了巴黎和會所遺留下來的紛爭種子外，無產階級革命在俄國的成功也造成這種組訓青年的活動在各國紛然崛起。列寧號召無產階級世界革命，不但使得各國社會黨人的行動備受當地政府關注，同時也促使後者採取更主動的政治、經濟、或保安行動來避免共產革命的發生或蔓延。這種對共產革命的恐懼或焦慮是造成各國相繼投入青年訓練和教育的重要背景，也是造成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組織青年團，以對抗無祖國觀念的共產主義的原因。與此同時，列寧本身對童子軍組織的改造，使其變成共產主義和計畫經濟實踐的先鋒隊，也開創了黨國化童子軍的先河。在共產主義青年團的領軍下，我們看到各式各樣的青年團或少年團，如雨後春筍般出現在歐亞大陸上。其中當然也包括 1938 年成立的三民主義青年團，和 1952 年出現在臺灣的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這些繼起的組織和後續的訓練效果，清楚說明 1910 年代後的世界競爭局勢，怎樣讓這種組訓青年的活動變成不能回頭的政治選擇。當然，英國童子軍在歐戰期間所表現的優異戰時服務與軍事才能，也證明這種身體教養確實有服務國族的功能，這也是它備受各國重視的原因。

然而，在觀視這個跨國的身體教養時，我們也不應該忽略這個發展與義務兵制在訓練身體上的關聯。因爲從 1870 年普法戰爭後，義務兵制就成爲歐洲各國相繼採行的國防政策，甚至日本也在 1872 年開始仿效德國，實施徵兵制度。<sup>60</sup>雖然德國並非自願實行義務兵制，但結果卻證明這確實是較募兵制或備

<sup>60</sup> 在 1870 年以前，法國陸軍一直是歐洲軍隊的學習榜樣，它在法令上也規定人民有當兵的義務，但富有者以金錢雇用文盲與貧民當兵卻是普遍的現象。這使得義務兵制成爲紙上的規定而已。見 Oscar Browning, *Wars of the Centur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Military Science* (London: W. & R. Chambers, 1903), pp. 403-404。日本雖然在 1872 年 12 月頒佈徵兵令，但初期的軍事訓練卻由法國軍官擔任，1885 年後才改由德國軍官負責，直到 1894 年甲午戰爭前夕爲止。有關日本的兵役改革與訓練，見 W. G. Beasley, *The Meiji Restoratio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pp. 361-365；M. D. Kennedy, *The Military Side of Japanese Life* (London: Constable & Company, Ltd., 1924), pp. 5, 295-298。

兵制來得經濟與可靠的國防體制。<sup>61</sup>1874年，瑞士立法規定，凡十至十四歲的少年，無論在學與否皆須接受體育訓練，以為服兵役的準備；而自十五到二十歲的少年，除了繼續接受是類訓練外，在十八歲之後還得加入射擊練習的動作，就是對這種結合民事與軍事生活於一體訓練的直接學習。<sup>62</sup>而這個民兵一體的制度也正是後來法國更改義務兵制，乃至全歐洲徵兵制度的參考或仿效的來源。從瑞士的例證中，我們清楚看到義務兵制對個體身體的要求和期待，並非從二十歲才開始，而是從十歲就開始。這個準備動作和它所形成的效益也可以在法國的「義務民兵制草案」中清楚發現：

預備教育，為自十歲至二十歲之兒童及青年而設，其主旨不在造就一軍事速成生，而在夫致其身體之健康與活潑。其方法，先教以徒手體操，各種步伐，協同動作，敏捷及巧妙的遊戲，射擊練習等。然後按順序教以擊劍、乘馬等，俾與日常之合規操作相融習，以期激發其競爭心，以期隨個人之天稟而發展其機能之力，以期治療或預防其身體之損壞。負管理及檢查此生理教育之責者，為所屬部隊之軍官及下士官，為官立私立各學校之教員，為地方醫生，為三十人軍事改良顧問會。<sup>63</sup>

這種自小就開始進行體能訓練和準備，俾使徵兵制度能順遂施行的動作，無疑也構成國家介入個人身體發展的重要依據。特別當徵兵制具有費少而兵多，不易形成武力私化發展，以及服役年限長達二十五年左右的好處時，自然形成國家不能袖手旁觀青年發展的利害考量。<sup>64</sup>這種由人力到國力的連結發

<sup>61</sup> 德國所以走上義務兵制的發展路徑，並不是自願的選擇，而是拿破崙在 1808 年給予它的條例限制。這個養兵不得超過四萬五千人的限制，讓德國放棄傭兵制，發展出「輪番上陣」的兵役制度，以培養復國雪恥所需要的兵力。見 Oscar Browning, *Wars of the Centur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Military Science*, pp. 101-102。

<sup>62</sup> 見蔣方震（蔣百里），《國防論》（臺北：文海出版社，1962），頁 127-128。原文〈裁兵與國防〉發表於 1922 年。

<sup>63</sup> 「義務民兵制草案」係法國社會黨領袖卓萊氏按瑞士的義務兵制修改而成，原文共十六條，上引文係第五條的內容。這個草案後來也影響英國和德國的義務兵制施行。有關草案的詳細內容，見蔣方震，《國防論》，頁 146-155。

<sup>64</sup> 義務兵役通常分為常備兵役、後備兵役、補充兵役與國民兵役四種。各國的規定雖有些微差異，



展，不但使得身體與其健康狀態成爲國家注目的焦點，同時也使得體育和公共衛生等成爲各國競相留意和發展的對象。中國在 1929 年公佈國民體育法規，聲明男女青年有受體育的義務，而父母或監護人則有督促的責任，以及要求學校於每學年開始時進行學生健康檢查。這些相繼出現的舉措，就如同舉行全國和各省區運動會一樣，都和這種兵役的徵召與國力的培養有著直接的關聯。<sup>65</sup>而這些動作的具體成形，也相對凸顯出國防經濟學在一次大戰後的發展，特別是它對人口數量、統一意志和健康等條件的注重，已經對中國形成一定的認知影響。蔣百里再三爲文討論總體性戰爭的出現，以及強調「生活條件與戰鬥條件一致者強，相離者弱，相反者亡」的生存原則，就是根據這個新的戰爭形式與理論思維所做的討論。<sup>66</sup>

當然，也是在這種國防經濟學的思維下，我們看到童子軍教育的另一個現實意義所在。簡單地說，從普法戰爭之後的兵制發展來看，童子軍教育對於肉體和精神的訓練，其實與義務兵制所講究的預備訓練，即從十歲就開始的身體訓練，有著莫大的時間和功能重疊。這個雙重的貼近讓它很難不成爲國家功利計算的對象。而 1914 年所爆發的歐戰，以及從這場戰爭中歷練出來的總動員概念，讓這種身心訓練變成價值上十分可取的訓練方式。這種潛在的服務國族功能，是造成童子軍訓練所以備受各國關注，甚至成爲中國學生必修科目的原因。貝登堡或許未曾預計到這種功能上的親近可能帶給童子軍的變化壓力，但義務兵制的開展和總體戰的出現，已經讓這種功能計算和考量變成難於扭轉的趨勢。這種不需要養兵，但卻源源有兵可用的國防經濟學，或者說，一種成本

---

但在互相仿效的結果下，差別實際不大。按法國「義務民兵制草案」第一條的規定，常備役爲二十至三十四歲的國民，後備役爲三十四歲至四十歲的國民，四十歲至四十五歲的國民則服守備役。1928 年，國民政府首次提出徵兵令案時，則是以日本的兵役法爲參考，採常備、後備、補充與國民兵役的劃分方法，服役年限和對象則是自十七歲到四十歲的男子。有關徵兵令案的提案說明與各式條文，見侯坤宏編，《役政史料》（臺北：國史館，1990），冊上，頁 1-48。

<sup>65</sup> 吳耀麟，《中國青年組訓問題》，頁 75。

<sup>66</sup> 見蔣百里，〈新兵制與新兵法〉，輯於蔣復璁、薛光前編，《蔣百里先生全集》（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71），第 4 輯，頁 227-312 對於「國民皆兵」概念和總動員體制的討論。另外，關於生活條件與戰鬥條件的說法，見蔣方震，〈從歷史上解釋國防經濟學之基本原則〉，收入《國防論》，頁 71-85。

極小、利潤極大的國防經濟計算，是義務兵制和童子軍訓練成爲普世選擇的原因，也是它們能夠登堂入室，主掌個體身體發展的原因。

很顯然地，1870 年後的世界局勢的確造成黑格爾所說的國家優位發展趨勢。雖然黑格爾的國家與市民社會分類說不見得適用於解釋後來的世界發展，但在民族國家競爭態勢分明的情況下，國家成爲獨立自主的個體卻是歷史的事實。隨著歐戰的發展與所謂「彈藥世界」的來臨，這種動員人力、物力和組織以因應總體性戰爭的時代也日漸變成一個真實。這種集全國之力以爲一戰的做法，不但改變戰爭的形式，也改變人與戰爭和人與國家的關係。而這種急劇的變動也影響當時歐力所及的中國。從新軍和軍國民運動的發展，到童子軍和軍訓教育的推動，我們都看到這種競爭壓力的存在。在這些學習與對抗的過程中，中國的身體經歷了前所未有的現代軍事教養。這是我們在研究和反省近現代中國的身體發展時，不能忽略的重要背景。當然，我們不能將這種武化的身體發展，簡單地看做是古老的「文武合一」概念在現代的復活或翻版。這種去脈絡化的觀念思考不會讓我們對歷史的發展，或身體的所以然，有具體清楚的瞭解。

## 結 論

從上述的討論中，我們可以清晰發現，從晚清之後，中國的身體就經歷著一系列的軍事教化過程。從各種武備學堂的設立，新軍的建立，物競天擇思維的闡揚，到軍國民教育和童子軍與軍訓教育的漸次施行，一場持續長久、規模宏大的武化身體運動就在知識分子和國家的努力下，出現在中國。這個企圖將「全民皆兵」的想法加以實踐的動作，自然和晚清之後中國所面臨的巨大生存壓力有著密切的關係，但是這種企圖組織和轉化人力以爲國力的動作，卻也讓過去處在「天高皇帝遠」的個體身體開始成爲國家凝視和用力的對象。當然在做這樣的評估時，我們不能將這種軍事化的身體建構，與當時的國家觀念、經濟生產、文化思維和法制更張，甚至是時間和空間的採擷使用，分開來看，因

爲這不是孤立的演變過程。除此之外，我們也不應該將這種演變抽離十九世紀中期後的世界局勢。因爲存在於民族國家間的權力版圖競爭，以及用以維繫這權力或地位的手段，也正在侵害著中國。甚至，更重要地，中國也正透過這些手段的學習和採用，來維繫生存與抵禦外侮。這種整體性思維不但可以讓我們宏觀地分析和思考事件之間的關聯，跨越個別事件的孤立性與個體性，同時也能讓我們對這個影響深遠的軍事化努力，有縱時性和系譜性的理解。

當然，從上述的分析中我們也看到，所謂全球化的發展其實並不侷限在經濟場域中，而且不是十分晚近才開始的過程。在兵制的建立與童子軍訓練的擴散過程中，我們都可以看到互相學習、模仿，甚或修改與挪用的例子。這種跨地域與跨文化的學習發展，和民族國家在十九世紀中葉後所面臨的嚴峻生存挑戰，有著莫大的關聯。在無能改變這種競爭趨向的情況下，使生活條件戰鬥化，甚至形成帶有總動員色彩的體制社會，就成爲許多國家面臨的必要選擇。中國走上軍國民教育路線，甚至推展童子軍和軍訓教育，以及組織三民主義青年團，實行徵兵制等，其實都和這種情勢的發展脫離不了干係。這種對身體的軍事教化和掌控，或者說，將身體視爲國家權力實踐的基礎，並沒有因爲國民黨的撤離大陸而終止。共產黨在 1950 年後以軍事編制組訓人民，進行軍事教練和勞動生產，以及強化青年團和少年先鋒隊的吸收工作，都清楚說明這種紀律化人民身體的工作，並沒有因爲共產革命的成功而結束，反而進入另外一個高潮。另外，這個源自於民族國家爭戰而產生的新式身體訓練，在 1949 年後也隨著國共內戰的延長與冷戰體系的開展，而成爲臺灣身體發展的重要部份。這個以動員戡亂爲名的身體教養和管控，以及它所達致的身體生產效果，也是我們必須加以關注的課題。

不過在結束這部份的討論時，作者必須指出這不是一個順遂的過程。也正因爲它不是按照當權者的期望與意圖而進行的過程，才有一波接一波以身體爲目標的動作在中國陸續出現。這些因應統治意圖和時局需要所進行的軍事身體教化，它所造成的逃避和身體抗拒，以及連帶產生對於軍訓體制的否定，是不

應該被低估的。雖然在本文的討論中，作者傾向以宏觀的角度來重構這個系列的身體發展，將一些看似分離的觀念、歷史、技藝和動作置放在一起，尋出一番發生的道理，但這並不代表身體是處在完全被動和被建構的狀態。在解釋這些觀念、技藝、動作和國家權力何以不能順遂實現時，我們不能僅只考慮客觀的物質條件、國家實力和戰爭的阻礙作用。身體的情感作用、好逸惡勞、怕死與自利等，也會讓這些觀念和權力技藝難以發揮作用。本文雖然沒有（也不能）對這兩者進行比較性的歷史評析，但不能否認的是，身體的消極配合、抵制和抗拒是一直都存在著，而且也是這些軍事身體建構無法畢其功於一役的重要原因。

## 徵引書目

### 一、專書

- 中國童子軍戰時服務第一團團史編輯委員會，《抗戰與童軍》。上海：大公報代辦部，1938。
- 王枋編，《嚴復集》。北京：中華書局，1986。
- 王爾敏，《淮軍志》。臺北：中國學術著作獎助委員會，1967。
- 史全生編，《中國近代軍事教育史》。南京：東南大學出版社，1996。
- 吳宓，《吳宓自編年譜》。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5。
- 吳耀麟，《中國青年組訓問題》。上海：商務印書館，1944。
- 吳耀麟，《青年訓練之理論與實際》。上海：商務印書館，1946。
- 李相昂，《訓育論》。上海：商務印書館，1935。
- 沈從文，《沈從文自傳》。江蘇：江蘇文藝出版社，1995。
- 來新夏編，《北洋軍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 拉斯洛·那吉(Laszlo Nagy)著，胡品清譯，《兩億五千萬童子軍》。臺北：幼獅文化事業公司，1986。
- 侯坤宏編，《役政史料》。臺北：國史館，1990。
- 段祺瑞等纂校，《訓練操法詳晰圖說》。臺北：文海出版社，1966。
- 孫中山，《國父全集》。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73。
- 張英美，《中華民國臺灣地區軍訓教育發展之研究》。臺北：幼獅文化事業公司，1999。
- 教育部軍訓處編，《學生軍訓五十年》。臺北：幼獅文化事業公司，1978。
- 教育資料叢刊社編，《小學校的少年兒童隊》。北京：新華書店，1950。
- 郭沫若，《少年時代》。上海：海燕書店，1949。
- 郭鳳明，《清末民初陸軍學校教育》。臺北：嘉新水泥文化基金會，1978。

- 陳公哲，《武術發展史：精武會五十年》。臺北：華聯出版社，1973。
- 陳獨秀，《獨秀文存》。上海：亞東圖書館，1922。
- 馮友蘭，《三松堂自序》。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9。
- 黃金麟，《歷史、身體、國家：近代中國的身體形成，1895-1937》。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1。
- 黃振涼，《黃埔軍校之成立及其初期發展》。臺北：正中書局，1993。
- 團中央少先隊工作委員會、中國少先隊工作學會編，《少先隊工作手冊》。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84。
- 臺灣省政府教育廳編，《臺灣教育發展史料彙編：訓育篇》。臺中：臺灣省立臺中圖書館，1997。
- 赫治清主編，《中國軍事制度史：軍事教育訓練制度卷》。鄭州：大象出版社，1997。
- 劉鳳翰，《新建陸軍》。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67。
- 蔣介石，《蔣總統集》。臺北：國防研究院，1961。
- 蔣方震，《國防論》。臺北：文海出版社，1962。
- 蔣復璁、薛光前編，《蔣百里先生全集》。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71。
- 蔣翼振編，《三民主義青年團三十一年度灌縣青年夏令營訓練紀實》。成都：青年出版社，1942。
- 魯迅，《魯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6。
- 羅爾綱，《淮軍志》。香港：香港書店，1973。
- Smethurst, R. J. 著，郭俊鈺譯，《日本軍國主義的社會基礎》。臺北：金禾出版社，1994。
- Baden-Powell, Robert. *Scouting for Boys*. London: Horace Cox, 1908.
- Baden-Powell, Robert. *Scoutmastership: A Handbook for Scoutmasters on the Theory of Scout Training*. N. Y.: G. P. Putnam's Sons, 1920.
- Baker, Philip. *Youth Led by Youth*. Doncaster: Vilmor Publications, 1996.

- Beasley, W. G. *The Meiji Restoratio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 Browning, Oscar. *Wars of the Centur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Military Science*. London: W. & R. Chambers, 1903.
- Kennedy, M. D. *The Military Side of Japanese Life*. London: Constable & Company, Ltd., 1924.
- Koon, Tracy H. *Believe, Obey, Fight: Political Socialization of Youth in Fascist Italy, 1922-1943*.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85.
- MacDonald, Robert H. *Sons of the Empire: The Frontier and the Boy Scout Movement, 1890-1918*.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93.
- Rempel, Gerhard. *Hitler's Children: The Hitler Youth and the SS*.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89.
- Reynolds, E. E. *Baden-Powell: A Biography of Lord Baden-Powell of Gilwell*.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2.
- Reynolds, E. E. *Boy Scout Jubilee*.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7.
- Rosenthal, Michael. *The Character Factory: Baden-Powell and the Origins of the Boy Scout Movement*. London: Collins, 1986.
- Shilling, Chris. *The Body and Social Theory*. Newbury Park: Sage Publications, 1993.
- Springhall, John. *Youth, Empire and Society: British Youth Movement, 1883-1942*. London: Croom Helm, 1977.
- Walker, Lawrence D. *Hitler Youth and Catholic Youth 1933-1936: A Study in Totalitarian Conquest*. Washington, D. C.: 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 Press, 1970.
- Wiskemann, Elizabeth. *Fascism in Italy: Its Development and Influence*. N. Y.: St. Martin's Press, 1969.

## 二、論文

王家儉，〈北洋武備學堂的創設及其影響〉，《師大歷史學報》，期 4，1976，頁 317-344。

吳志濱，〈民國初年國術角色的演變與精武體育會的興起及啓示〉，《國術研究》，卷 2 期 1，1993，頁 3-15。

沈松僑，〈國權與民權：晚清的「國民」論述，1895-1911〉，《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 73 本第 4 分，2002，頁 685-733。

胡適，〈從一黨到無黨的政治〉，《獨立評論》，號 171，1935，頁 10-12。

高一涵(Robert Culp)，〈中國童子軍：南京十年童子軍手冊中的公民訓練與社會意識〉，《新史學》，卷 11 期 4，2000，頁 17-63。

張佛泉，〈梁啓超國家觀念之形成〉，《政治學報》。臺北：中國政治學會，1971。

陳鐵，〈國中童軍訓練的實際問題〉，《中等教育》，卷 24 期 1-3，1973，頁 56-58。

黃金麟，〈革命／民權：訓政的敘事建構〉，《清華學報》，卷 27 期 4，1997，頁 459-492。

蔣百里，〈軍國民之教育〉，《新民叢報》，號 22，1902，頁 33-52。

奮翮生，〈軍國民篇〉，《新民叢報》，號 1，1902，頁 1-10。

羅羅譯，〈歐洲和會之結局〉，《東方雜誌》，卷 16 號 8，1919，頁 17-27。

羅羅譯，〈歐洲自由報紙對於和約之批評〉，《東方雜誌》，卷 16 號 10，1919，頁 19-23。

Chickering, Roger. "World War I and the Theory of Total War: Reflections on the British and German Cases, 1914-1915," in Roger Chickering and Stig Förster, eds., *Great War, Total War: Combat and Mobilization on the Western Front, 1914-1918*.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 The Production of the Militarized Body in China, 1895-1949

Hwang Jinlin\*

### Abstract

If we consider the militarization of the body in modern China from a genealogical perspective, then the “Military Education Decree for Secondary and Higher Schools” issued by the Kuomintang (KMT) government in 1928, seems to be just one critical stage in its development. It was not the starting point of a particular sequence of events, nor did it represent an innovation unique to China. Although the decree was tied directly to the status of the KMT government, it was also related, in the sense of a genealogical progression, to the military reforms and soldier-citizen education that had begun in the late Qing. In additio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militarily trained body also had a close logical connection to the concepts of total war, economic planning for wartime, and conscription that had developed out of the First World War. This article thus offers an overview of how and why the Chinese body began a process of militarization, the specific role of the KMT, and the influence of new forms of warfare and military service.

**Keywords: New Army, boy scouts, military education, total war, conscription**

---

\*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Tunghai University